

前言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观察世界最基本的轴线。在时间这一轴线上,人们思考问题需要有历史观;在空间这一轴线上,人们思考问题需要有地理观。

按广义的理解,所谓地理,不仅包括人类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日月星辰,山岳平原,江河湖海等;也包括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交往的媒介物,如大气,风云雨雪,动物植物等;还包括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现象,如社会,风土人情等社会各种生活以及村落、都市等。毛泽东对地理的理解,就是一种广义的地理观,比如,他在 1915 年给萧子升的信中,就将风俗列为研习地理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对地理非常重视。学生时代,他赞同顾炎武“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的治学态度,1917 年和 1918 年两次与同学在湖南徒步旅行,考察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1920 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教语文,给学生出的第一道作文题就是:“试述本地方的风俗习惯。”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除了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外,另一门课就是“地理”。毛泽东在地理课中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的关系,要求学生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还要了解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对政治的影响。他每到一处,都尽量阅读当地方志,以了解该地的风土人情,地貌物产。

海伦·斯诺说,毛泽东是一位天生的地理及智力方面的探索者。从韶山到北京,83 年的时间里,他在中国版图上匆匆地行走。中国 20 多个省份的城乡留下了他的足迹;从韶山的农间小屋,到井冈山的八角楼、延安的窑洞,再到中南海游泳池,他住过的地方在 1000 处以上。

海伦·斯诺把毛泽东的地理探索与思想发展并列而论是有道理的。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中,有地形、地利、空间以及依附于空间的各种生活现象这样一套东西。因此,他思考问题有全局观,也更务实。毛泽东的思想是通过吸收各种来源而形成的,地理因素不仅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内容。而毛泽东对中国最持久的贡献,正是他的思想。

毛泽东在故乡韶山生活了 17 年。故乡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最初出发点,到过韶山的人,往往会联想起这片秀丽山川与一代伟人成长之间的关系。吴玉章 1961 年 12 月到韶山参观,在留言簿上写了两句话:“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

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认识,无疑与他在韶山的 17 年乡村生活有关。这一认识以后发展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应当转移到农村去。毛泽东开辟的这条中国革命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关键。但迷信风水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并不这么看。在红军连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后,他认为红军的发展并非人力之功,实乃天荫之效,是毛泽东得其祖坟地灵之光。因此,他派一特务队去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

毛泽东当然不会相信所谓龙脉贯祖坟之说,但他对故土一直抱着眷恋之情。建国后,他到杭州时常住汪庄,汪庄背后,有一块不大的草坪,缓缓地向夕照山倾斜上去,山坡上遍生着翠竹。毛泽东喜欢这里,他说坐在这里就好像回到了他的故乡。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屋后的山坡上,也有一块这样的坪地。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住了 17 年,他喜欢住在这里。菊香书屋前一片田,是北京内城里最后一块耕地,西南方向的水边,还有一座不高的小山,这种格局很容易使毛泽东想起他韶山的故居。

但是,如果毛泽东一直生活在韶山,他只会成为一个农民。如果按他父亲的设计,他或许能成为一个富裕的粮商。

1910 年秋天,毛泽东离开了韶山。他改写了一首诗向他的农民生活告别,诗中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此后的 17 年中,毛泽东行走在长沙、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城市之间。与行色匆匆的旅程相一致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在许多情

况下是逐年甚至是逐月变化。

城市生活使毛泽东有机会接受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面对来源于西方的各种新思想,毛泽东是个自学者。面对中国革命,更是如此。从孙中山到陈独秀,没有一个革命家知道怎样才能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没有一个“革命大师”可供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中国革命在城市受挫后,他将视野再次投向了农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建议毛泽东去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1949年3月,毛泽东以“赶考”的心态来到北京,从此在这里居住了27年,领导着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毛泽东逝世以后,人们在这个城市的中轴线上建立了一座纪念堂,他的遗体被安放在纪念堂里,让世人瞻仰。

毛泽东的人生长征以这种形式结束,并非他的本愿。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农民气质。回到乡土,是毛泽东的愿望。1976年夏天,毛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地理因素影响着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写作此书,正是试图将这种关联揭示出来;揭示毛泽东的历史发生在哪里,那里又发生了什么?试图融合时间与空间这两条轴线,探究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与演进,并试图做到以历史随笔式的文字,发现地理,经纬历史,缩放事物。

要特别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朱卫东先生,他提出了本书的写作计划,并在写作中给予了有益的启示。

李立志

2007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一、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 3

毛泽东是一位天生的地理及智力方面的探索者,而他的探索,就是从韶山开始的……

- 1.出乡关:人生无处不青山 3
- 2.回韶山:敢教日月换新天 9
- 3.别故园:正是神都有事时 16

二、长沙: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23

长沙尽管不是毛泽东的出生地,但长沙对于毛泽东的意义却不寻常。长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国家改造的思想得到初步阐发的地方,也是其早期活动的实践地,此外,长沙还是毛泽东私人情感的发生地……

- 1.激扬文字 24
- 定王台 24
- 湖南第一师范 27
- 当教员的毛泽东 31
- 2.此情可待成追忆 35

识字岭	35
清水塘22号	36
板仓	39



三、上海：开天辟地 43

建于1915年的甲秀里是一幢老式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毛泽东1924年7月后一段时间曾住在这里。现在，为保护甲秀里花的钱，建造10幢同样的房子都够了。不少人认为这里有灵气，甚至有商人要求专门在旧居里摆个祭坛让他们上香……

1.黄浦江岸送友	43
2.开天辟地	47
博文女校	47
兴业路76号	50
3.国共合作	53
三曾里	53
甲秀里	55



四、广州：拿笔杆子的毛泽东 59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一派文人的形象，是拿笔杆子的毛泽东。1926年5月到9月，毛泽东在广州番禺学宫主办了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这一届农讲所也成为他与周恩来共事的开始……

1.拿笔杆子的毛泽东	59
------------------	----



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新河浦24号	60
东山文明路215号钟楼礼堂、惠州会馆	62
东山庙前西街38号、中山四路42号	64
2.还是农村问题	69
东山小岛1号楼	69
棠下村	70

五、武汉：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辛亥革命使中国革命进入到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革命中擎起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毛泽东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1.路过武汉	75
2.寻路	78
都府堤41号	79
武昌红巷13号	81
鄱阳街139号	84
3.大江东去	87

六、江西：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西是毛泽东一生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更是留下他革命印迹极重的地方。毛泽东一生最艰难，最苦闷的时期是在江西度过的，但他一生的辉煌事业也是在江西奠基的。他在这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1.上井冈	95
安源	95
三湾	99
井冈山	101
2.赣水苍茫	108
瑞金	109
兴国	114
于都	117
3.庐山风云	120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	122
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	124
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	126
4.千里来寻故地	129



七、七度入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 133

1929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命运一样,胜利与挫折交替,希望与失意相随。在闽西,毛泽东就曾经度过了几段失意岁月……

1.遭贬	133
牛牯扑、临江楼	133
长汀、福音医院	136
2.给林彪的一封信	139
廖氏宗祠	139
协成店	141

苏家坡	143
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45



八、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49

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称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他的得意之笔。

1.遵义	149
2.赤水河	154
土城	154
娄山关	155
茅台	157
3.拥抱与分裂	160
会理	160
懋功	162
巴西	165
4.吴起镇	168



九、延安:既开风气亦为师 173

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是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的有机结合,简朴自然,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毛泽东到陕北后,入乡随俗,住进了黄土高原的窑洞。

1.窑洞	174
2.世界发现毛泽东	180
3.既开风气亦为师	186



十、重庆：为和平奔走 193

1945年8月29日晨，毛泽东在林园散步，在林阴处与蒋介石不期而遇。两人并退左右，来到林园一座八角凉亭内，在石桌上首次交换意见，至今林园还保留着当年两人合谈的石桌。这次他们谈了40分钟，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单独谈话。

1.两宿林园	194
2.在桂园办公	197
3.三顾特园	200
4.到桃园访戴季陶	203
5.红岩村	204



十一、西柏坡：最后的农村指挥所 209

西柏坡，原名“柏卜”，唐时即有村落，因村后翠柏苍郁而得名。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从花山村来到西柏坡，他驻足而赞：“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1.路过五台山	209
2.暂住城南庄	212
3.最后的农村指挥所	214
4.西柏坡的客人	218
5.新中国的蓝图	222



十二、辽宁：“共和国的装备部” 227

东北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也是中国工业基础最好的地方，曾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共和国的装备部”。毛泽东对东北的关注，反映了他对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的思考和探索。

1. “向北发展” 227
2. “我可不想当李自成” 230
3. “鞍钢宪法” 232
4. “毛主席的好工人” 235



十三、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 239

南京作为帝王之都，几度繁华，几度衰败。民国时期的南京，它最浓重的色彩是鲜明黑白色，南北对峙、国共纷争、全民族抗日联合，带来的是战云密布、金戈铁马，殷殷血水。

1. 钟山风雨 239
2. 历史的延续 243
3.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245



十四、杭州：风驰又已到钱塘 249

杭州不大，却成名很早，湖光山色，处处沉淀着历史和文化。毛泽东喜欢杭州，或许是因为在杭州，他才可以回归他的文人心态，诗人本色。

1. 刘庄、汪庄：“我的第二个家” 249

2.终究是一位过客	254
3.风驰又已到钱塘	262



十五、河南：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269

河南是中原文明发祥地。毛泽东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油然而生的便是对历史的追怀。脚踏深厚民族土壤，向历史靠近，向未来走去，这是毛泽东的历史观；他靠近了历史，也在书写着历史。

1.许昌：《自明本志》好文章	269
2.新乡七里营	272
3.郑州	276
毛泽东“点兵”	276
说服大家“右倾”	278
关心河南“灾情”	280
4.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282



十六、山东：一城山色半城湖 289

有人把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与孙中山的故里翠亨，孔子故里曲阜相提并论。曾经崇拜资产阶级学说、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对孔子这样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1.到曲阜	289
2.到济南	292
“不扰民、不害民”	292

游一山一湖两泉	294
英雄山上祭故人	297
3.两访大辛庄	299



十七、北京:进京“赶考” 305

1949年3月,毛泽东以“赶考”的心态再次来到京城,从此在这里居住了27年,领导着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他逝世后,人们在这个城市的中轴线上建立了一座纪念堂,他的遗体被安放在纪念堂里,让世人瞻仰。

1.信仰	305
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吉安所左巷8号 ...	305
北京大学红楼	308
福佑寺	310
2.赶考	312
3.“中国道路”	317
4.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320
5.纪念堂	324

主要参考书目 328

海伦·斯诺说，毛泽东是一位天生的地理及智力方面的探索者。从韶山到北京，83 年的时间里，他在中国版图上匆匆地行走。地理因素不仅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他思想的内容。而毛泽东对中国最持久的贡献，正是他的思想。

一、韶山冲

孩儿立志出乡关

1972年11月至1973年1月，海伦·斯诺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以《续西行漫记》的作者身份，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海伦中国之行的目的之一，是追寻毛泽东从1893年12月26日出生，到晚年深居北京的人生长征。

1973年1月6日，海伦·斯诺冒着这一年的第一场风雪，到了韶山。后来她这样抒写对韶山的最初感受：

“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都是他们重要行程的一部分。韶山坐落在一个小山谷里，是一个很小的村庄。远处，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佛教寺庙，高高地坐落在一个圆锥形的山顶上。毛泽东和他的母亲，常常爬到山顶上去，因为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海伦·斯诺说，毛泽东选择的活动场所，无论是从自然环境，还是从建筑艺术方面看，都是极其美丽、极富历史价值的地方，他是个天生的地理及智力方面的探索者。毛泽东的探索就是从韶山开始的。

1. 出乡关：人生无处不青山

以“出乡关”作为标题，是因为毛泽东要成就一生的事业，注定要走出韶山冲。

韶山在衡山山脉的西北边缘，突起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丘陵地带，自西向东逶迤而来，形成一条十里长冲。随着山的走势，又形成许多个走

向不一的小山冲。《湖南省志·地理志》引《嘉庆一统志》卷354载：“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因名。”据传，舜帝的这次音乐盛会，不仅感召了远近的民众，而且还吸引了山中的麒麟前来共舞，天上的凤凰一起歌唱。孔子后来赞叹：“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乐成九韶，音至凤至”也就成了千古佳话。

毛姓是韶山冲的大姓，占到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但韶山并非毛家世代祖居，毛氏祖宗迁韶，从其鼻祖毛太华算起，至今不过600余年的时间。从第一代至第六代，韶山毛家没有固定谱系，乾隆二年第一次修族谱和光绪七年再修族谱时，制订了从第七代开始的固定谱系，合起来恰成一首五律：“六显荣朝仕，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从第一代毛太华算起，毛泽东是韶山毛氏的第二十代子孙。

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与兄弟分家后，从原来居住的韶峰脚下的东茅塘搬到上屋场来，就是现在的“毛泽东故居”。最初只有5间半草屋，屋顶全是用稻草盖成的，到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时，屋顶盖上了瓦，并建成13间房屋，形成了现在的格局。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出生在韶山冲的这家普通的农民家庭里。



韶山毛泽东故居

无论是毛恩普还是毛顺生都无法预料的是，这间乡村民居，将成为一所圣堂，被后人瞻仰。1929年4月，国民政府曾没收毛泽东在韶山的全部房屋和家产，这栋房子和里面的家具遭到了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进行过多次修葺，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挨家挨户找回了原来的家具和农具，使之基本上保持了当年原貌。1950年，故居作为革命纪念地供国内游客参观。两年后又正式对外宾开放。



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看到的“毛泽东同志故居”七个黑底镏金大字,是1983年4月2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题写的。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过韶山,参观过这间民居。“文革”时期,这里迎来了参观高峰,现在这里的人流仍然很多。每年毛泽东诞辰的12月26日和他去世的9月9日,这里会放上三天三夜的鞭炮,地上的纸屑有一尺多厚。董必武、聂荣臻1959年3月到韶山参观后的留言是:“鲁之尼山,粤之翠亨。以拟韶山,差可比伦。”将韶山与孔子、孙中山的故里相提并论。先是故乡给予了伟人生命,后是伟人给故乡增添了光辉,甚至使之成为圣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并不多见。

故乡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最初出发点,到过韶山的人,往往会联想起这一片秀丽山川与一代伟人之间的关系。吴玉章1961年12月到韶山参观,在留言簿上写了两句话:“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故乡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带给人们最直接的经验正是韶山淳朴勤劳的乡风,强悍而善良的民风,加上毛顺生倔强而严厉的家风,陶冶了少年毛泽东勇猛坚强的俊秀资质。

毛顺生精明能干,性格倔强,又有吝啬自私的一面。毛泽东反感父亲的暴躁、自私,却又继承了父亲的倔强个性,因此与父亲常有冲突。后来毛泽东用政治术语分析他家的形势。他说,他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的父亲,是“执政党”,而毛泽东和他的母亲、弟弟,有时包括雇工在内组成“反对党”。但在这个“反对党”的“联合战线”内也有意见分歧,他的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反对直接打击“执政党”的企图或公开的感情流露。母亲往往成为毛泽东与父亲发生冲突时的调和者。终其一生,毛泽东一直没有认同毛顺生的做法,他75岁时曾对一些红卫兵说,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也要坐“喷气式”。

毛泽东的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唐



1919年春，毛泽东和母亲文七妹、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1919年10月，毛泽东和父亲毛顺生（左二）、伯父（左三）、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920年1月因伤寒病去世，终年52岁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1919年10月病逝，终年52岁

家托，今属韶山市大坪乡，与韶山冲只隔一座云盘山，相距10多里路。毛泽东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文家自认是文天祥的后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文家子孙都必须背得出文天祥的《正气歌》。后来有人向毛泽东问起此事，毛泽东说，我是文家的外甥，《正气歌》也能倒背如流。文七妹勤劳俭朴，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富有同情心。毛泽东敬仰母亲身上的这些优良品质，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母亲去世后，他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利人的，自己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的影响力，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南岸私塾

1902年,父母把毛泽东接回韶山入私塾读书。16岁前,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私塾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曾读了不少孔孟之书,同时对《水浒》、《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有浓厚的兴趣。1910年,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故事,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这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这场有20多万人参加的暴动最后被镇压,几天内被杀的有1000多人,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城门外示众。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毛泽东听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整个一生。”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呼吁社会改良,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实现君主立宪制。这对于从未读过新书的毛泽东来说,真正是耳目一新。后来他与埃德加·斯诺说:“《盛世危言》激起了我重新学习的欲望。”

他还接触到一本谈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30年后毛泽东回忆说：“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头一句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中国台湾的经过，谈到了缅甸、越南等地的主权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切导致毛泽东走出韶山去寻求更多的现代知识。

但到1910年秋天前，毛泽东足迹所及仍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坵，父亲给他安排的前程是到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13岁的时候，毛泽东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强烈起来，他在老师毛宇居的命题诗《咏井》中说：

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圉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不想成为井里之鱼的毛泽东，最初想到的是离开韶山去县城，他以为县城就在某处的一个山谷里面。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找到了他，他才知道这次离家出走，不过是绕来绕去兜圈子罢了，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8里。外面世界的吸引力，使毛泽东最初并不反对去湘潭学徒。但就在这个时候，表哥文运昌告诉他，离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讲授新学。对新学已有所接触的毛泽东听了很动心，决心进这所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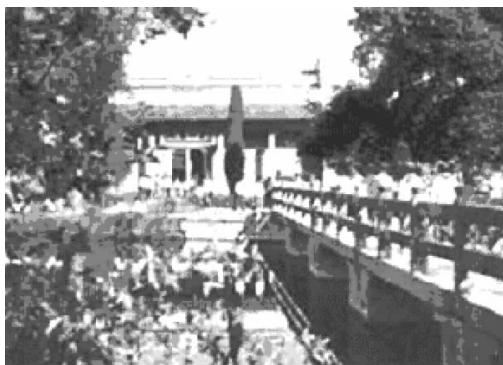
曾国藩就是湘乡人。由于出了个曾国藩，湘乡在全国名声赫赫。1880年，湘乡土绅许时遂、黄光达等十余人，因本地学子求学不便，发起集资筹建东山书院，1905年书院改建为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是按照现代学校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的。当时课程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体育、图画、音乐等。学校以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教学内容新著称于时，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子。除毛泽东外，肖子升曾就读于1班，肖三就读于2班，柳宗陶就读于4班，易礼容就读于7班，陈赓和杨幼麟就读于9班，毛泽覃就读于10班，谭政就读于16班。国民革命



时期,湘乡的农民运动是闻名全国的,领导这一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校友。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思想,而且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启蒙教育,眼界大开,萌发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后来他说过:“我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教育”,“我在这个学堂有了不少进步”。

但毛顺生执意要毛泽东去湘潭的那家米店去学做生意。为此毛泽东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文季范劝说父亲。经大家的劝说,毛顺生觉得进洋学堂也许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就同意了。

1910年秋天,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离开了闭塞的韶山冲。临行之前,他改写了日本一个叫月性的和尚写的言志



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湘乡。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井冈山。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到了西柏坡。当他1949年又一次来到北京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

2. 回韶山:敢教日月换新天

走出了韶山冲,决心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毛泽东,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1921年初,他和在长沙读书的小弟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他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劝说他们要舍家为国,出去做点事。过完春节,原来在家

当家理事的大弟毛泽民随毛泽东来到长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校务，他的妻子王淑兰也一同去了长沙。毛泽东又把从小在他家长大的堂妹毛泽建送到长沙建本女子职业学校读书。这样，毛泽东带着他的弟妹们，一起走出了韶山冲。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们都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离开了韶山的毛泽东并没有脱去身上的农民气质，还有那与生俱来的对农民命运的关怀。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回到了韶山冲，一直到这年8月离开。毛泽东在韶山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国民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到了偏远的乡村。在这期间，毛泽东错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以及首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中共四大强调的是城市工作，“五卅”运动的主阵地也在城市。就在同事把目光放在城市时，毛泽东却使韶山成为湖南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这无疑预示着毛泽东事业的新的开端。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这封密电，上面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看信后写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

毛氏宗祠(韶山农民
夜校旧址)





信上写着“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于是,在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

1927年1月,毛泽东又一次回到韶山,这次韶山之行,是他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一部分,一共待了32天。这次考察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看法,根据考察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使毛泽东获得了“农民运动之王”的称号。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了这篇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早年农家生活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及思想情感上同农民的息息相通,似乎在引导毛泽东寻找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之路。看到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在乡亲们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说:“30年后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各位父老乡亲!”

到1959年,32年过去了,毛泽东重回韶山。毛泽东出生和成长在韶山,但是使韶山广为知名的,还是这次他回乡祭祖的行程。

毛泽东对故乡,对乡亲是有感情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能回韶山,便让长子毛岸英代他探望父老乡亲。他要毛岸英在他身边学习了2个月的韶山话,以免语言不通,让乡亲们有隔阂感。他还嘱咐毛岸英,不要有架子,要走路回去,打赤脚回去,到20里外的银田寺就下马,代表我回去看



1951年9月毛泽东邀请少年时代的好友张有成(左一)、房兄毛宇居(左二)、表兄文梅清(右一)赴京叙旧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父母墓前鞠躬行礼

望家乡的亲人和革命前辈。毛岸英按照父亲的教导去做了。半年后,他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并永远地埋在了那里,再也回不到故里了。

韶山冲有三支毛氏祠堂。1927年回韶山时,家乡的农民协会在毛泽东那支的毛震公祠为他举行欢迎仪式。32年后重回韶山,毛泽东走进了毛震公祠,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鞠躬再说。6月26日清晨,毛泽东没有告诉随行人员,独自踏着露水,爬上山,在杂草中找到自己父母的坟墓,在坟前三鞠躬,静默良久,对随后赶来的工作人员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随行的湖南省接待处工作人员临时用松枝和野花扎了一个花圈,毛泽东恭敬地把它放在坟墓上。回到松山宾馆,他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毛泽东1975年在长沙休养时,本想回韶山看看,为父母扫墓,韶山也做好了接待准备,但因身体原因,没能如愿。

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思考最多的是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而农民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无疑是影响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曾有很高的估计。1955年他就认为: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



主义。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开始有了变化。他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产品跟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许多同志觉得,农民现在忽然变得跟无产阶级一样,或者更高,农民现在是第一,而无产阶级呢?变成二哥了。毛泽东开始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农民的小生产者特性。

1959年6月毛泽东南下视察,24日到达长沙。本来准备7月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突然决定会址改在江西庐山,同时提出明天回韶山去看一看。毛泽东是想在开会前进一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韶山的乡亲们是敢对他讲真话的。回韶山前,他特别与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约法三章:这次不要派部队去;特别是不要派公安人员去;“在我的家乡,我要随便接见群众”。



毛泽东和启蒙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毛泽东故居对面是谢家屋场,这时已是土地冲的公共食堂。墙上新刷的石灰标语清楚显目:“公共食堂好”,“饭菜样样香”,“干部群众喜洋洋”。毛泽东扫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说:“怕不见得。好不好,香不香要群众自己说。”

毛泽东问起刚从田边爬上来的毛霞声粮食产量问题。毛霞声的父亲是大革命时期“雪耻会”的成员,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毛泽东对毛霞生说,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这时,毛霞声是生产队长和食堂管理员。

毛泽东问现在亩产多少斤,毛霞声说800斤。毛泽东问是一稻800斤还是两稻800斤,毛霞声开始说一稻,毛泽东要他讲真话。毛霞声红着脸说,是两稻,一稻只有400斤。毛泽东问,那怎么要讲800斤呢?毛霞生指着在场的公社、大队干部说,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



毛泽东在毛霞生家中做客



毛泽东在视察故乡的稻田

这时,一个饿得精瘦的汉子敲着饭钵向他诉屈来了。老远就听见他的声音:“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4两实只125克)。做事冒得力,全都懒洋洋。”他就是毛泽东塾师邹春培的孙子邹长卫。毛泽东听后脸色顿时严肃起来。

毛泽东又问公社分管食堂的公社福利部长胡金培:“办食堂,社员自愿不自愿?”“自愿。”“自愿?”毛泽东追问:“怕是你们强迫的吧?”胡金培的脸一下红如血泼。毛泽东见她一副窘态,摇摇头,不再提食堂的事了。

26日晚上,毛泽东在松山招待所设宴招待乡亲。开饭前,毛泽东提议开个座谈会,请乡亲们提意见。乡亲们谈到了对密植问题,负担过重问题,也谈到了对公共食堂的不满。宴会中毛泽东给乡亲们敬酒,可当他端起酒杯来到他们桌边,桌上的菜都吃光了。看到这种情景,看到依旧是皂布粗衣,一脸菜色的父老乡亲,毛泽东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吃多少饭,他就下了席。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寓所里召开座谈会,接见当地干部群众,听取对韶山生产、生活情况的汇报及群众的意见。对乡亲们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说,



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讲真话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他还要求韶山的各级干部每年向中央汇报两次韶山的情况。

6月27日,毛泽东要离开韶山。吃过中饭,乡亲们便络绎不绝地赶来松山招待所,为他送行。公社干部安排送行的人排成两行纵队,队伍从松山招待所一直延伸到韶山公社机关,长达1公里。毛泽东从招待所出来,先和左边的人握手,从左队队首握到队尾,又从右队队尾握到队首。就这样,毛泽东前后和两三千群众握手,前后握了两三个小时。毛泽东就这样依依惜别了他的乡亲。

毛泽东的故乡之行,调查了人民公社化后韶山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从中窥见了中国农村的总形势。所见所闻,使毛泽东感到忧虑。看



韶山学校的少先队员
给毛泽东系上红领巾

到从前种过的田地,被荒废作苗圃,山上的树都被砍了时,他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湖南说要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像这个样子,恐怕30年也改变不了呀!他对乡亲们吃不饱饭很担忧,对周小舟说,现在粮食到户,要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年老的吃稀点,壮年的吃硬点。回北京后一年半,毛泽东派胡乔木率中央工作组进驻韶山,同时派陈伯达去广东,田家英去浙江,具体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不久后,韶山的公共食堂全被解散。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看到了问题,又坚信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坚信建立人民公社最终能改变农村面貌。6月27日下午离开韶山前他与松山1号寓所的服务人员合影,问大家:你们说人民公社好不好?大家都说好,他说,我们共产党做事就是这样,一旦把问题纠正后,人民公社好得很。更能反映毛泽东这种心境的,莫过于那首写得大悲大喜,气势宏放的《七律·到韶山》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3. 别故园:正是神都有事时

滴水洞位于韶山冲西北面一个狭长山谷中,但这里并没有山洞,只是历来沿袭的一个地名而已。滴水洞一带碧峰翠岭,茂林修竹,山花野草,舞蝶鸣禽,《毛氏族谱》这样描述滴水洞的景色:“一钩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有近人赞誉滴水洞风光:“三湘灵秀地,洞中别有天。”

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到韶山水库游泳,看到对面秀丽的山谷,兴之所至,对周小舟说: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
在韶山水库游泳

1960年,他又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及此事。这样,1960年到1962年,湖南省委模仿中南海的建筑格局,在这里用青砖砌造了一片风格古朴的乡间别墅。1970年,欧阳海英雄连队在别墅后修建了长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侧有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洞的两端各有厚度近尺,重达几吨的装有自动控制的粗重铁门。据说,即使洞外施放原子弹,也无损洞内指挥系统和洞里人员的安全。



滴水洞

滴水洞管理极严,一度十分神秘,知道它的人极少。1986年秋,经湖南省委省政府批准对外开放。现在看到的滴水洞景区,包括三大核心部分:以一号楼为中心的别墅系列;西面以毛泽东祖坟,虎雕、虎亭、滴水清音为主的虎歇坪景观系列;东面以毛泽东曾祖父母坟、龙泉三叠、奔龙泉池、观音远眺为主的龙头山景观系列,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来此游览参观。

1966年6月17日到2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住了12天。

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6月16日,毛泽东住在长

沙九所。由于天气炎热,九所的房间又没有空调,他一夜没有睡好。于是第二天就搬到滴水洞了。当时滴水洞工作人员专门用冰块堆在他床下用电扇吹,房间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在滴水洞,毛泽东的饮食与在北京时一样,一日两餐饭,分别在下午2点和晚上11点。吃得很简单,一般不超过四菜一汤,当年湖南省接待处特级厨师石荫祥留下了在滴水洞为毛泽东主厨的一份菜谱:红烧鲫鱼、火焙米虾炒辣椒、苦瓜烧肉、青炒马齿苋、雄鱼头打葱汤,干饭二两,烤玉米一只或稍加面条。

一天中午,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去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参观。汽车停在外面,人们有说有笑陆续上车。毛泽东问贴身服务员,他们都要去什么好地方。服务员说,去瞻仰您的旧居,还要参观陈列馆。并请毛泽东一起去。毛泽东一听,顿时消失了先前的兴致,但又不失诙谐地说:“你们去吧。我不去,我知道我在那里站岗!”毛泽东是指陈列馆中的毛泽东塑像。他反对到处竖立他塑像的做法,曾当面指责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你们睡大觉,让我四处站岗。”1967年7月5日,他还明确指示林彪、周恩来:“此类事情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刮起一阵浮夸风”;并要求林、周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发一指示,加以制止。毛泽东曾对基辛格说过:“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被人们神化了的毛泽东其实更多的是感到孤独。

在滴水洞,尽管陆续有地方领导过来,但毛泽东很少接见和谈话,在12天



滴水洞1号楼,1966年
毛泽东在此住了11天



里,他不与外界联系,每天看从北京送来的材料。

毛泽东的孤独或许是由于他太高大了,或许是由于他走得太远。离开滴水洞时,毛泽东接见大家,开着玩笑说:“以前我带着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但当时并没有人深究这句话的含义。而在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表明了这句话的深意。他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就是在这封信中,他这样描绘自己在滴水洞生活:“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之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当时跟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认为,这封信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到武汉后加上了头尾。

毛泽东在他的第二故乡杭州,在他的故乡韶山观察和思考着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思考着国家人民的命运。于是,便有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诗写得沉郁甚至苍凉,记录了毛泽东此时深沉复杂的心境。

1966年6月28日,是毛泽东此次在滴水洞的最后一天。

1910年秋走出韶山时,他留下了“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言壮语。

1927年离开韶山时,他说,30年后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各位父老乡亲!

1959年,他是带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热切希望离开韶山的。

而这一次,他的心境却多了些难舍与伤感。早晨7点多,毛泽东与大家合影留念。照完相,他向厨师石荫祥致谢,并和韶山管理局王毅忱局长寒暄了几



毛泽东在韶山故居和
家乡的干部、群众合影



毛泽东在滴水洞和
湖南省部分领导合影

句。仿佛预感到以后再难回来,他竟毫无去意地坐下休息。有人小声催他上车,他却用地道的韶山腔说:“你们走吧,我再坐一会儿!”服务员给他端来一杯韶峰云雾茶,缓缓地喝完茶后,毛泽东才站起来跟送别的人一一握手。当他跟廖时禹握手时,有人介绍说,小廖是看管房子的。毛泽东笑着打量廖时禹,嘱咐他:“你要把房子管好,我还要回来的。”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赤子心,故土情。在以后的日子里,尤其是毛泽东重病期间,他一直惦念着故乡韶山,惦念着滴水洞。在韶山,在滴水洞,有他祖先的坟茔,有他刻骨铭忘的骨肉亲情,还有他难忘的儿时记忆。1976年夏天,毛



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当时,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待病情稍有好转,便满足毛泽东这个愿望,回韶山休养一段时间,还通知了湖南有关部门作好接待准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湖南省公安厅厅长唐瑞庭,一北一南,一直在做着毛泽东回故乡的准备。

然而,毛泽东终究没有实现叶落归根的愿望。1966年6月28日,竟是毛泽东和故土的永诀。



长沙尽管不是毛泽东的出生地,但长沙对于毛泽东的意义却不寻常。长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国家改造的思想得到初步阐发的地方,也是其早期活动的实践地,此外,长沙还是毛泽东私人情感的发生地……

二、长沙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长沙”这个名字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于浏阳河与湘江的交汇冲淘,江中渐渐生长出长长的沙洲,谓之长沙。

湘江自广西灵川县海洋山而来,穿林越野,接纳百川,入长沙,又西接靳江、浏水,东纳浏河、捞刀河。除了湘江,长沙还有著名的白沙井水。“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竭,长沙第一泉。”白沙井在明朝的《长沙府志》上就有记载。但使白沙井广为人知的,还是毛泽东的诗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湘江之西便是岳麓山。岳麓山是南岳衡山山脉的一部分,南岳有72峰,以衡阳市回雁峰为首,长沙岳麓山为足,故名岳麓。“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因为湘江、白沙井,因为岳麓山,长沙有“山水名郡”之称,是一个既具水之秀美,又有山之灵气的城市。

既有山,仁者聚;既有水,智者居。长沙有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岳麓书院,岳麓山上有宋真宗、理宗和清康熙、乾隆的题赠,晋陶侃,唐裴休、宋朱熹的寓所,也曾留下杜甫、刘长卿、刘禹锡、韩愈、柳宗元、辛弃疾的足迹。

进入近代的长沙,因其人才辈出,成为新旧中国转

长沙岳麓山下毛泽东背手像
(1976年9月9日立)



换过程中所需人才的重要输出地。这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之一,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都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这里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徐特立、谢觉哉、胡耀邦、李富春、萧劲光、许光达、王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求学,从事革命活动。

长沙尽管不是毛泽东的出生地,但长沙之于毛泽东的意义却不寻常。

长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国家改造的思想得到初步阐发的地方,也是其早期革命活动的实践地,此外长沙还是毛泽东私人情感的发生地。韶山冲给了毛泽东物质生命和早期的社会生活,而长沙却成了毛泽东政治生命、情感历程的开端。对于人的生命历程而言,其初始点总是那么令人魂牵梦绕。对于在长沙的经历,毛泽东写道: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激扬文字

定王台

1910年,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第一次出远门,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



读书。但“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志愿注定毛泽东的步伐不会停留在小小的东山。1911年春,毛泽东因为成绩出众,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来到了另一个大天地——湖南省会长沙。

新的生活空间给了毛泽东强烈的新鲜感,同时随着见闻的日益增多,毛泽东对于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也在加深。当得知孙中山这个人 and 同盟会的纲领后,毛泽东马上在学校墙壁上第一次公开地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由孙中山、康有为等来组织民主政府,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推翻专制独裁的清王朝。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尽管第一次发表政见还显得稚嫩,但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不寻常,它开启了毛泽东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人生历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炮声,似乎给毛泽东的人生展示了另外一种前程。12月22日,长沙发生了起义。毛泽东带着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期待,在月底加入了起义者的阵营,成为驻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当了兵的毛泽东仍注意保持着自己的学生身份。当时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与一般士兵的另一个差别是,毛泽东有每天阅读报纸的习惯,且百读不厌。他每月7元的军饷中,除去伙食用去2元和花钱买水外,剩下的都用在订报纸上了。不过,这种军旅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1912年袁世凯上台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毛泽东退出了军队,重新进入学堂。

在军队里毛泽东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但在学堂里,毛泽东却因其文字小有名气。1912年6月毛泽东作了《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得到国文教师的极高评价,全文仅600字,批评却有150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炼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种评价。他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希望对当今的中国和世界多一些了

解。毛泽东觉得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自己满足,于是他选择了自修,每天到定王台的省立图书馆看书。

定王台是长沙文脉之所在,原址在旧城东隅浏阳门内,即今长沙图书馆侧,为汉景帝之子刘发所建。刘发因其母出身卑微,远封长沙。刘发禀性至孝,身在长沙,常常思念远在长安的母亲,遗憾自己不能侍候身侧,于是用车运米至长安敬奉母亲,从长安载泥土转到长沙,筑成一台,朝暮思亲,即登台遥望西北,终生不辍。刘发死后,追谥为长沙定王,故此台被称为定王台。刘发立为长沙王27年,政绩不为一般人知晓,而他的六代孙刘秀却开启了东汉一朝基业。后人诗说:“王已分封受汉恩,长沙终不及中原。后来争得三分气,却是东都六代孙。”古代文人认为,刘秀得天下,肇基于刘发之孝行,所谓中华文化孝为德先,誉为首善,善有善报。因此,定王台历来为人推重。

1904年,湖南巡抚赵尔巽首倡,梁焕奎等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青年人募捐集资,在定王台创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05年,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庞鸿书先后增拨库银,扩建馆舍,采办图书,定名为湖南图书馆;1912年1月,民国肇始,遂更名为省立图书馆。



定王台图书馆(点石斋版画)

毛泽东定了个自修计划,非常认真地执行。每天早晨馆门一开他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他的午饭,晚上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这段自修期间,毛泽东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

肄言》等,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他在图书馆还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他发现,原来世界是那么大。



湖南第一师范陈列馆内的城南书院复原模型

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了半年时间。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但难以为继。他住的湘乡会馆住了一群士兵,他们经常滋事,毛泽东在这里住不下去了。父亲也不再给钱他,除非他进学校读书。

湖南第一师范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的,一师是秋季开学,他重读了半年预科。毛泽东抵住了后来一切招生广告的诱惑,读到1918年暑期毕业,做了5年半师范生。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位于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北去的湘江,与岳麓山隔江相望。湖南第一师范创建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其前身是南宋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美誉。

妙高峰曾是长沙城南第一名胜,1936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还着力赞美了妙高峰的美:夏间近晚之际,坐憩其地,清风徐来,胸襟顿爽。残阳自麓山反映天际,云霞与江面烟波,互相照耀,往来风帆,悠扬拾映,诚可观也。妙高峰下的第一师范,建筑风格仿照日本青山师范学校,集东方文化内涵与西方建筑风格于一体,校园走廊迂回,联结一个个美丽的庭院,典雅古朴,宁静别致。



1913年的毛泽东



1911年一师全景

1929年,湖南当局借口一师出“暴徒”和“过激派”,为“端正趋向”、“挽回风气”,将其迁至国民党省党部毗邻的省党校院内开办,谓之“新一师”。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一师妙高峰校舍化为灰烬,唯一留下的就是一口古井。1968年,国务院特批500万元复建湖南一师,依旧是仿日建筑,院子里还栽了一些樱花。

一位同学后来这样描述读师范时的毛泽东: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服,鞋子破旧。他的脸部生得相当大,但眼睛既不大也不锐利,看起人来也是直愣愣的。他的鼻子是典型的中国鼻,耳朵很匀称,嘴相当小,牙齿白而整齐。这一口好白牙使他笑起来相当有魅力,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他不真诚。他走路来很慢,两腿合不太拢。他坐下或站起来的动作都是慢吞吞的,而且讲话也很慢,但无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在一师读书的几年,毛泽东总共花了家里160块钱。这笔钱里,有三分之一花在购买书报杂志上。在老长沙的玉泉街、府正街经常留下毛泽东的身影,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旧书卖。从1911年当兵时,他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直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他还有个习惯是,每天黎明时分就到校内的水井边取井水洗澡,一年四季从不中断。现在还常有人到这口井里取水带回家,说是“圣水”可以治病。



毛泽东强调自学,但也注意跟同学交流,向老师讨教。给他印象最深的教师是杨昌济。一师的学生称杨昌济为“孔夫子”,能获得这个称号,是因为在学生心目中他的道德行为卓绝绝伦。杨昌济很器重毛泽东,评价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并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国藩、梁启超的例子勉励毛泽东。

毛泽东还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这样评价他的朋友们:“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只愿谈论譬如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类的大事。有一次他去一个青年家里,这人对他说起要买些肉,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毛泽东生气了,以后再也不与那人见面了。

毛泽东常和朋友读书聚会,纵谈时势,探求真理。有时晚饭后,他就和同学穿过学校的体育场,爬到校园后面的妙高峰,坐在星月之下,一面高谈阔论,一面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爱晚亭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长沙爱晚亭与北京陶然亭、滁州醉翁亭、杭州湖心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始建于1792年,坐落在岳麓山清风峡,东望岳麓书院,北、西、南三向面山,亭后两条小溪自幽壑中潺潺而来。1952年重修爱晚亭时,毛泽东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之请,题写了“爱晚亭”三字。

橘子洲、平浪宫、禹王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或臧否



杨昌济



爱晚亭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二排左四是周世钊；
左八是何叔衡；五排左四是毛泽东



蔡和森

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步韵唱和。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晚年还不时回忆。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为“奇士”。他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他在日记里曾如此记下自己的人生箴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湖南一师另一个大出风头的学生是蔡和森,报纸上称他们为“蔡毛”。岳麓山刘家台子,是蔡和森1917年到1920年在长沙租住的房子,也是毛泽东和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场所。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这里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13人参加了成立会。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存在了3年,先后有七八十名会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后来成为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新民学会成立2个月后,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了。以后他一直没有回过



第一师范。有一次他的车队从学校门口经过,被当年的同班同学、后来的校长周世钊拦下来,但他没有进去,说是怕打搅学生上课。

当教员的毛泽东

按常理,师范毕业是要到小学当教员的。但山地与水域的环境激发出的湖南性情,使湖南人不可能安于现状,他们的心是向外的,急切地关注与进入外边的世界。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和罗章龙等24名湖南青年去了北京。

因母亲病重,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周世钊在修业小学任教,经他推荐,校方聘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6节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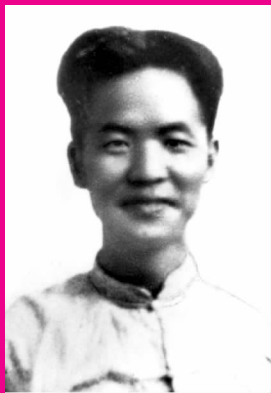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的工资不多,除吃饭外没有什么剩余,生活异常艰苦。他的行李很简单: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作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如此描述小学教员的生活:“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教课,忙得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我们变成了留成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教给我们的真



蔡和森
故居刘家台子



1920年的毛泽东



邓中夏

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毛泽东呼吁:“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我们要想不做奴隶,除非联结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1920年9月,毛泽东得到了提升,应湖南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担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一直到1921年夏。

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实际负领导责任。同时他被聘任湖南第一师范22班国文教员。他推荐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

由普通的小学教员提升为小学主事,再到创办自修大学、成为师范学校的教员,几年中,毛泽东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也完成了他革命生涯的几次关键转折。

组织发动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开始。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邓中夏,湖南宜章人。1915年秋他考入湖南高等师范,通过蔡和森的介绍,他经常在周末到长沙“板仓杨寓”(杨昌济在长沙的寓所),聆听老师杨昌济的教诲。就在“板仓杨寓”,邓中夏认识了同样前来求教的毛泽东。1917年6月,邓中夏随父亲到了北京。1918年秋两人在北京相逢,他们一个北



大中文系学生,一个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1919年春,两人还一起前往长辛店考察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因此,邓中夏到长沙后,就找到了毛泽东。这次会面,对毛泽东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组织湖南的五四运动,毛泽东由一位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成为一名令人瞩目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组织者。

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学联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修业小学离商业专门学校很近,毛泽东参与学联的大量工作,成为学联的实际领导者。但毛泽东对湖南政治运动作出的贡献更主要是通过办报实现的。1919年7月14日,湖南学联创办的《湘江评论》试刊号正式出版,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个多月内,他竟为《湘江评论》写了40多篇文章。他自己写文章,自己编辑,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毛泽东常常是写到深夜,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讲课。

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开端。1921年10月后的长沙出现了产业界组织化、学生组织化迅速发展的现象。这与共产党组织民众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毛泽东这样回忆道:湖南党,那时我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勃发展的劳工运动。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



湖南自修大学是长沙船山学社旧址创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党、团干部的革命学校



1959年毛泽东在游湘江后在农家院内小憩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游泳馆游泳。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休养了114天

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评价:“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从此毛泽东完全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这也意味着,作为毛泽东革命开端地的长沙将在他的行进图中暂时暗淡起来。毛泽东1923年9月回到长沙筹建国民党,12月底离开长沙;1924年12月,回长沙养病,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年,不久回韶山;1925年8月底再度到长沙。1925年秋,毛泽东作《沁园春·长沙》,似乎是对其在长沙的经历以诗歌的形式进行总结。1927年10月,毛泽东发动了秋收暴动,想拿着枪去敲开长沙城的大



门,但是失败了。

此后,独特的农村革命道路使毛泽东与长沙越发遥远了。毛泽东再来长沙是建国后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来过长沙至少50次。最后一次回长沙是1974年10月13日至1975年2月3日,这次他在长沙休养了114天。这期间,王洪文、江青、邓小平和周恩来都来过见过毛泽东。江青带来了一些毛泽东喜欢的玉米、小米。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自己“腿不行了”,周恩来立刻蹲下,按按他的下肢,问他有没有浮肿。2月3日,毛泽东突然离开长沙,说是让工作人员好好休息,过个好年。临走时,他和大家告别,大家都哭了。

2. 此情可待成追忆

识字岭

长沙识字岭北起浏城桥,南止人民路,现为闹市,原为浏阳门外一片荒山,有碎石小路,取名石子岭。1918年有人在此设私塾教授蒙童,故雅化为识字岭。从清代至民国,岭上为刑场。

1930年11月15日,《民国日报》登载了在识字岭枪杀杨开慧的消息:经清乡部审讯,对努力共党工作,煽惑妇女,扩大红军女卫队,扰害湘鄂赣各省地方不讳,已于昨十四日下午一时,监提女共匪毛杨氏一名,绑赴识字岭刑场,执行枪决。

就义前,杨开慧贴身穿了件新做的白布衣,外面罩着一件蓝旗袍,脚穿洁白的袜子,黑色带绊的粗布鞋。她把3个孩子托付给了保姆陈玉英。

杨开慧是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被捕的。那天晚饭后,国民党清乡队第三次赶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包围了杨家大屋。杨开慧被捕后,板仓杨家按照

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发动社会名流设法援救。蔡元培、章士钊等社会名流发来电报,要求开释杨开慧。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准许,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予以保释。但杨开慧拒绝了。

此前,1930年7月26日拂晓,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至8月6日撤出,实际占领长沙11天。这是杨开慧离红军距离最近的一次,但仍在70多公里外。当时何健只身逃于湘江西岸,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说:“没有活捉此贼,此恨犹存!”

清水塘22号

1920年冬的一个晴日,在湖南一师附小毛泽东住所,毛泽东与杨开慧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婚宴上,朋友陈昌朗诵了一首写给他们的诗:“杨师爱徒,师之爱女,切磋琢磨,亲密相处。北海订情,西窗共许,志同道合,共造寰宇。”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在她写的回忆中,谈到了与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



今日清水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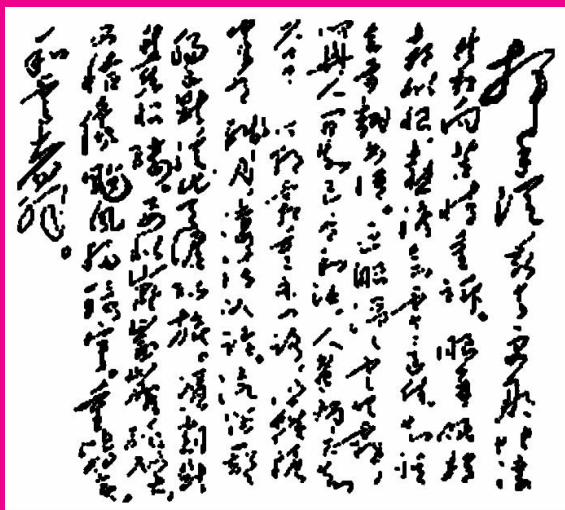
清水塘22号

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从1920年冬到1927年8月,除了四五次短暂分离外,在长沙、韶山、广州、上海和武汉,毛泽东和杨开慧一起生活了六七年时间。

7年中,他们相聚在一起共同生活并从事革命活动时间最长的地方是长沙清水塘22号。

清水塘在长沙小吴门外。这里有上、下两口池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上塘水流入下塘水即明亮清澈,故名清水塘。当时这里是长沙市的近郊区,附近只有几间农舍、瓜棚等。清水塘22号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开间平房。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随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为便于开展党的工作,毛泽东通过易礼容用7块大洋租下了这座房子,作为党的地下机关。毛泽东一家住在这里,1923年4月他离开长沙去上海,而杨开慧带着孩子一直居住到1924年的5月。



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手迹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又来到了清水塘。团聚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年底,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个清冷的拂晓,两人依依不舍地别离。坐在车窗旁,毛泽东记下了他的情思: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纪念杨开慧烈士
发行的邮票首日
封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很钟爱这首词。到了晚年,他还多次修改,一直到1973年。这里收录的是作者的修订稿。但这首词直到毛泽东逝世一年后始披露于报端。

板仓

杨开慧是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今开慧乡开慧村)人。板仓地处长沙、平江、湘阴、岳阳4县交界处,距长沙城70余公里。

板仓杨家老屋始建于清末,土木结构,盖小青瓦,面垅背山,坐北朝南,房舍以上、中、下三栋平行排列,前低后高,前有防护矮墙,形成院落。栋栋之间形成小院或天井,院内植桂花和女贞树。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生在老屋居后进东头北间。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杨开慧从武汉回到板仓。

8月13日,毛泽东也来到了板仓。8月17日,杨开慧陪毛泽东到长沙城。不久,杨开慧回到板仓,毛泽东去了江西,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



杨开慧纪念馆前的杨开慧塑像

在板仓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杨开慧一直思念着毛泽东。她在《偶感》诗中写道:“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杨开慧以日记式的《散记》写道:“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十多天了,半月了,一月了,总不见来信。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杨开慧 1930 年 1 月 28 日写道:“伤心的日子依然来了,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至于三年……”

杨开慧把自己写的这些文字藏在杨家老屋墙壁的砖缝里,直到 1983 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人间。



杨开慧就义后，归葬离板仓杨家老屋 300 米处的棉花坡。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刊，民国十九年冬立。”墓碑是当时毛泽东托人带钱到板仓修的。

毛泽东从报纸上得到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写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这封信通过层层封锁才到达，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建于1915年的甲秀里是一幢老式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毛泽东1924年7月后一段时间曾住在这里。现在，为保护甲秀里花的钱，建造10幢同样的房子都够了。不少人认为这里有灵气，甚至有商人要求专门在旧居里摆个祭坛让他们上香……

三、上 海

开天辟地

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1927年上井冈山之前,很多时间是在大城市度过的,长沙、武汉、广州、上海、北京,是他活动的主要地区。

毛泽东一生曾50多次到上海,建国前他去过上海10次,时间在1919年3月到1926年11月之间。早年在上海的经历,对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就是在上海奠定的。

1. 黄浦江岸送友

中共一大前,毛泽东3次去上海,都与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行有关。

1915年,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法华教育会,掀起了历史上声势浩大的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得最好的省份之一,据1921年华法教育会名册登记,总共赴法勤工俭学者1600多人,其中湖南籍的最多,有346人。新民学会对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1918年8月,毛泽东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开长沙去北京。毛泽东在北京一直待到第二年春。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14日绕道到达上海。这是毛泽东与上海结缘的开始。



萧三

这次在上海的逗留虽然短暂，但第一次上海之行还是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行程中的一些细节，很多年后他仍记忆犹新。毛泽东告诉斯诺，从北京出发时，他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后来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毛泽东，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途中他到了曲阜，登了泰山。到南京时，他又一名不文了，而且仅有的一双鞋也被偷了。一位老朋友给毛泽东买了一双鞋和足够买到上海车票的钱。就这样，毛泽东完成了余下的旅程，当然，他要随时留神着他的新鞋。在上海，毛泽东参加了两次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送走了两批赴法留学生。到上海后，毛泽东了解到华法教育会已经募集了协助学生留法的款项，还拨出了一些钱帮助毛泽东回湖南。送朋友们上轮船后，毛泽东就启程回长沙了。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行程推迟，毛泽东不能在上海久待，就离开上海去北京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去了。

1920年4月1日，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当时在北京的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顺便送萧三等赴法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的合影

勤工俭学的会员。

5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8日,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议决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为: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半淞园名自杜甫“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句,景色秀美。会议中间大家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送别讨论会延至天晚,继之以灯,各人都觉得有说不尽的话。11日,毛泽东与在沪会友送萧三等6人赴法留学,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岸。

新民学会会员有18人留法勤工俭学,其中包括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瓚、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萧三等人。毛泽东是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但他并不是这个队伍的成员,他有自己的想法。毛泽东曾解释道: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知识,研究些有用的革命道理,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好好研究本国问题。他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他也计划自己出国留学,直到1921年9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去俄国留学,至少5年。但后来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

毛泽东前两次到上海住过的地方,都无从考证了。1920年5月5日到7月7



(上)毛泽东与
章士钊



(下)安义路63号

日,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时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也就是现在的安义路63号。1958年,上海市委指示有关方面查找毛泽东早期来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住宿地,经过多方查证才确认了这个住址。此处原是犹太人哈同的房产,1958年查证到时是一座废弃的庵堂。此后,上海市文物局收回了安义路61号至67号的4幢房屋,将居民迁出。当初的设想是,63号复原开放,61号用来做办公室,65号和67号用于做接待。现在这个区域已经是上海繁华的商业地带,北侧是高耸的嘉里中心,西面是越洋广场,东头接着的铜仁路是上海著名的咖啡馆聚集之地,唯独南侧还留着这几幢老房子。

住在民厚南里63号的毛泽东开始仍醉心于工读互助生活。他和彭璜、张文亮等一起,“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每人每月只有3块零用钱,常常吃蚕头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毛泽东还在一家洗衣店当过伙计,月薪12块至15块钱,但有8块都转耗在车费上了。1个月后,他们发现了这种生活的弊端。彭璜写信给朋友说,上海工读互助团“现在竟不能说不失败”。毛泽东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



“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毛泽东在上海拜会了章士钊。毛泽东是1919年经杨昌济介绍认识章士钊的。杨昌济病重时,曾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我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和组织一部分同志赴欧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找到章士钊帮助。章士钊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2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1963年,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千元钱还给章士钊,1972年送满累计2万元。1973年初,毛泽东告诉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这个钱要一直送到章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

毛泽东还拜会了也在上海的陈独秀。毛泽东同陈独秀讨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这时,陈独秀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备组建共产党。

2. 开天辟地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到:“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920年11月,毛泽东接受陈独秀的正式委托,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等。第二年6月,李达在同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代表2人于7月到上海开会。

博文女校



“宁乡四髯”1926年于长沙，
左起为谢觉哉、何叔衡、姜梦周、
王凌波

博文女校



1921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与何叔衡从小西门码头乘船离开长沙，同行的还有新民学会的会员萧子升。晚上船到洞庭湖，他们站在甲板上欣赏夜色。萧子升发现毛泽东口袋里带着一本《资本主义制度大纲》的书，问毛泽东：“你研究资本主义，就能成立共产党了？”毛泽东浅浅一笑，没有回答他。毛泽东和何叔衡乘船经汉口，7月初到达上海，住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校长是黄绍兰。黄绍兰，湖北人，原名学梅，早年酷爱《木兰辞》，为花木兰替父从军所感，取别字绍兰。她1910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后与黄侃结婚，并成为章太炎唯一的一位入室女弟子。1916年，她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等租望志路一所民房创办博文女校，因资金问题1920年停办。1921年黄



绍兰得到张謇之兄的资助,又租白尔路389号复校。

现在的太仓路127号,是一幢三上三下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这就是博文女校的所在地。董必武是黄侃的好朋友,为联系一大代表住处,他写信给黄侃和黄绍兰,称有一个北大师生旅游团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提供方便,借博文女校小住。然后由李达直接与黄绍兰会晤,事情很快就解决了。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均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这里。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前半间,其他代表分住西面沿街的小间。代表们在这里讨论交流,起草文件,完成了中共一大的准备工作。

1955年2月,中央指示博文女校停止对外开放。后一度借给京剧院做宿舍,1966年迁出。1977年修缮后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现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保护管理。



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

兴业路76号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对中共一大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1951年4月，查实确定中共一大会址在兴业路76、78号（原望志路106、108号）。会址查实后即开始修缮工程。1952年初修缮工程告竣。同年9月，会址内部亦布置就绪，中共一大会议室布置在楼上，开始内部开放，征求意见。当时要来参观，需要到市委宣传部登记，批准后才可进入。

博文女校不远的兴业路76号，是一幢一上一下结构的上海石库门式建筑，它和西邻的兴业路78号一起原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建造于1920年秋天。走进76号大门，穿过天井，便进入会客厅。这个客厅面积只有18平方米，面积虽小，但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中共一大上，不少人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所以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在听。会议期间，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些代表记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

刘仁静回忆，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毛泽东经常沉浸在思考之中。李达回忆会议期间，毛泽东常在房间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少。”

毛泽东与多数中共一大代表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对毛泽东的文章并不陌生。山东代表王尽美见到毛泽东，说：“润之，你的《湘江评论》办得真好！你的大作《民众的大联合》目光远大，议论痛快！”毛泽东回答：“你们的《涿源新



刊》也办得不错,文章切中时弊!”

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天已经有48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

中共一大还有5名代表。

陈公博于1922年公开支持陈炯明,并称不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战期间,陈公博投敌,任汪伪政权的立法院院长。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陈公博被推举为伪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南京伪政府的“一号人物”。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乘飞机逃亡日本,后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投敌叛国罪判处陈公博死刑,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对陈公博的死刑。3日,陈公博被枪毙在苏州狮子口。

周佛海1924年脱党,四一二政变后投靠蒋介石。抗战期间参加汪伪政权,



毛泽东与李达

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抗战结束后，周佛海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国民党军队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他进行公审，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佛海死刑。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死在南京狱中。

李达，1923年脱党，但他一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48年毛泽东曾3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带信给李达：“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预经营。”但因为患严重的胃溃疡，李达未能去解放区。1949年5月，在地下党的护送下，李达到达北平。1949年12月，经刘少奇做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作历史证明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后来，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到武汉时，告诉湖北省领导人，有一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被问及这人是不是李达时，毛泽东说，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病重的李达被关进牛棚。李达写了张纸条向毛泽东求救：“主席，我现在有难，请你救我一命。”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李达已被迫害致死。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为名叛逃。中共中央得知后，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劝说张国焘，促其觉悟。周恩来将张国焘接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向他提出3点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党最希望的；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是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1个小时后离开长江局，留下一张纸条给周恩来：“我选择第三种办法。”中共中央得知后，开除其党籍。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1949年后张国焘流落海外，1976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去世。

刘仁静是12名代表中最年轻的，当年只有19岁，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



生。大革命失败后,他成托洛茨基派的信徒,1929年被开除党籍。1950年12月31日,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刊登声明,表示: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仁静受到冲击,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起床后,按惯例到自己住宅对面的北师大广场参加晨练,在穿越马路时,被22路公交车撞倒,颅骨碎裂,当场死亡。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199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大修了一次,新增了中共一大全部代表的蜡像。在这组蜡像里,只有毛泽东是站姿,其余代表以各种姿势围坐在方桌旁。

3. 国共合作

1923年4月,毛泽东第六次来到上海,此后的两年中,他往返于上海与广州之间,成为国共合作时期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政治家。

三曾里

1923年4月,湖南督军赵恒惕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向继任中共湘委书记的李维汉做完移交后,便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月,他离开上海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第七次来到上海。

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并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由于广州地处一隅,粤汉铁路尚未全部通车,给中央与全国各地中共地方组织联系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中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

共中央决定迁回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交通联络方便的上海。受中央委托,中央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物色中央局所在地,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在三曾里租了一幢两层楼房,作为中央局机关的办公地。

三曾里处在闸北宝山路地区,离上海北火车站一 two 里路,里弄内仅3个门牌,故称三曾里。这一地区交通便利,通讯联络方便;有几十家缫丝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工人达数万人,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还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所辖的中共上海大学、商务印书馆两个中共组,党员较多,党的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和掩护。这一地区与租界毗邻,遇紧急情况时,便于迅速向租界转移。

三曾里中央局机关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毛泽东、罗章龙,及蔡和森、向警予夫妇都住在这里。毛泽东住在一楼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一楼后厢房,罗章龙住楼上。他们对外就说是王姓兄弟一家人,从事报关的职业,户主是向警予。所以,这里又被人称为“三户楼”。陈独秀的寓所离这里不远,但在楼里专门设有床位,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住在这里。除陈独秀外,经常到三户楼的还有王荷波、瞿秋白、朱少连、项英、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等。李大钊、谭平山、恽代英开会时也来过这里。

中共三大后,推动国共合作成为全党的重要工作。当时湖南的国民党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人,遵照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离开上海回长沙,到湖南筹建国民党。经过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毛泽东的努力，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4年2月，毛泽东离开广州，第九次到上海，仍住三曾里。6月初，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开始也住在三曾里。三户楼有严格的制度，不准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上街游逛，不到外面照相。只有杨开慧初来上海时，经过向警予的同意，才例外地带着孩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就是那张杨开慧右手抱着岸青、左旁依着岸英的相片。

三曾里中央局机关旧址在1932年被日军飞机炸毁。

甲秀里

毛泽东1924年7月后住所甲秀里的考证开始于1958年。1960年，曾有人当面问过毛泽东，毛泽东只记得是在慕尔鸣路，在瞿秋白住处的附近，但确切门牌他已不记得了。后来确认为慕尔鸣路318号甲秀里，也就是现在的威海卫路583弄。

建于1915年的甲秀里是一幢老式的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当时，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在楼上，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的厢房。毛泽东的住处很简

单,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床,上面罩着一顶细布蚊帐,床边放着一张给毛岸青睡的宁波式小摇篮。窗下是一张三屉书桌,当时,毛泽东患有神经衰弱症,体质很弱,但晚上除偶尔到上海大学去演讲外,都在这张书桌上伏案工作至深夜。

1924年在上海时,毛泽东在共产党内担任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外,还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过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组织部秘书等职。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伦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等共产党员,担负着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44号为“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是国共合作的极力推动者,注重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以至被党内有些人嘲笑为“胡汉民的秘书”,指责他同国民党合作的热情太高。但另一

方面,他也主张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予以反击,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1924年7月,国民党左派胡汉民、汪精卫等离沪,右派代表人物戴季陶到上海。戴季陶到上海后,与叶楚伦等人把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千方百计排挤和打击上海执行部内的共产党员。其中,毛泽东是他们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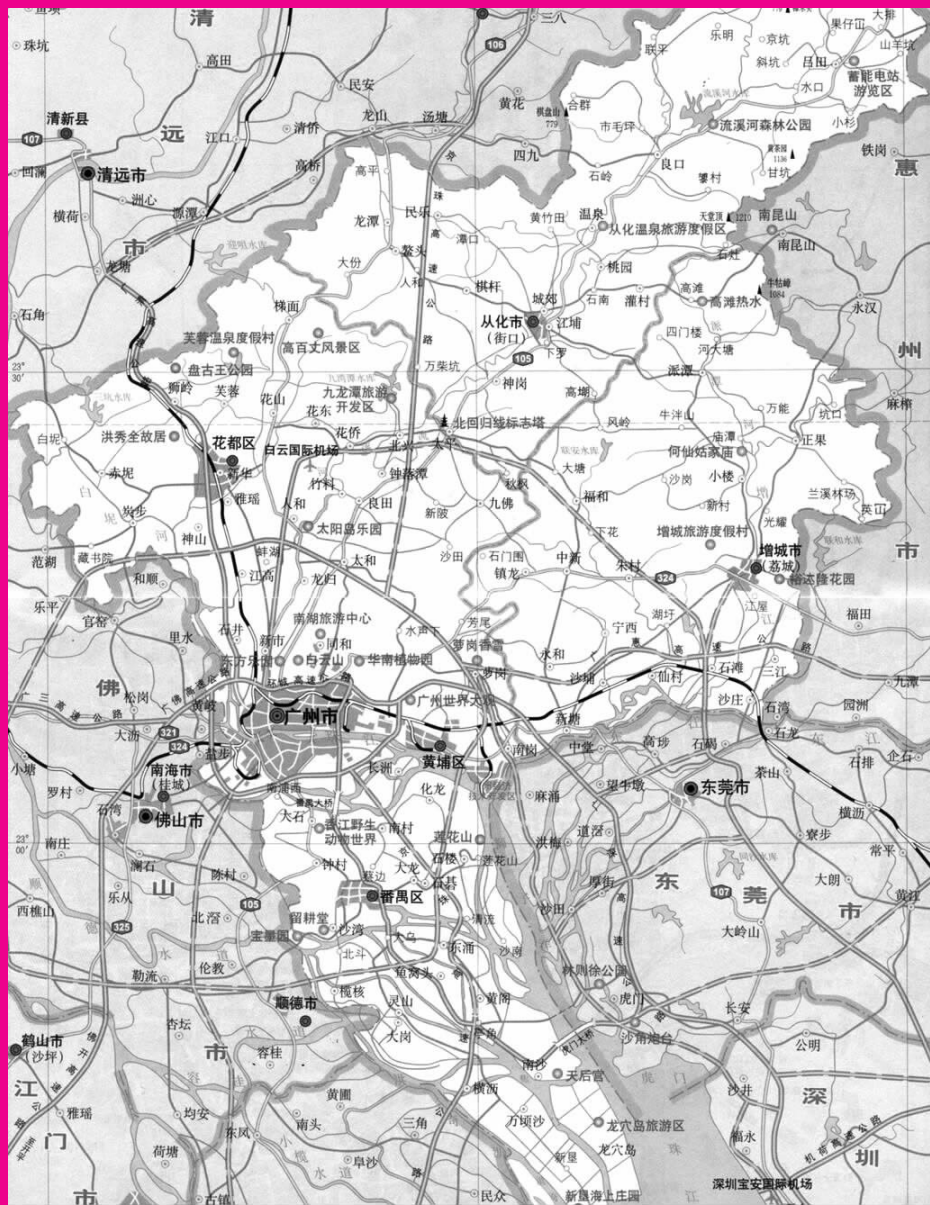


1963年在上海打球



打击和排挤的对象。7月中旬,毛泽东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一职,专任文书科主任。但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分子之间的斗争继续在进行着。叶楚伦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伦等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1999年12月甲秀里正式开放,知名度不高,一年最多也就几千人来参观。现在甲秀里的四周都是高楼大厦,但周边房地产的开发并没有对甲秀里的生存形成致命的挤压。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文物的保护,另一方面,开发商对于甲秀里也“心存敬畏”。由台湾投资商开发的高层写字楼,最近的建筑距离甲秀里不到2米,主体大楼也只相隔15米。2001年开发时,为了甲秀里的保护,额外投资了1千多万元用于地下灌浆。为了保护甲秀里花的钱,造10幢同样的房子都够了。不少人认为这里有灵气,甚至有商人要求专门在旧居里面摆个祭坛让他们上香。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一派文人的形象,是拿笔杆子的毛泽东。1926年5月到9月,毛泽东在广州番禺学宫主办了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这一届农讲所也成为他与周恩来共事的开始……

四、广州

拿笔杆子的毛泽东

从1923年到1961年,毛泽东先后11次来广州。其中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3次,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8次。

1. 拿笔杆子的毛泽东

1923年至1926年,是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由酝酿到合作再到走向破裂的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来往于湖南、上海和广州三地,湖南是他发动农民运动的基地,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三地为毛泽东展露其政治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对毛泽东而言,这一阶段是他1927年前事业的鼎盛时期。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秘书,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时期毛泽东给人留下的是一派文人形象,是拿笔杆子的毛泽东。迪克·威尔逊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一书中,转述了郭沫若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形象的描述:毛泽东留一头短发,中分,倒向两边,一瞥之下给人一种谦恭有节而又深奥莫测的印象。皮肤白皙,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在中国人中,特别在革命党党员中,说话声音这么柔和的人还真是少见。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

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新河浦24号

1923年6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住新河浦24号春园。

广州东山有四大名园。一是恤孤院后街1号的可园,1920年,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一家曾在此小住;一是大沙头涌北岸的葵园,曾是汪精卫的临时公馆;还有一处是寺贝通津42号的隅园,是国民革命军海军造船总监伍景英自己设计的私人住宅。还有就是新河浦的春园。四园当中最著名的当属新河浦春园了。中共三大召开时,会议代表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包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住在春园。他们在此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起草大会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新河浦路上连在一起的22号、24号和26号3幢建筑统称春园,是由一名黎姓华侨和另两位华侨出资于1922年修建的。春园借鉴了欧美建筑风格,又糅合了广东传统民居的特点。当时这里出门见水,周围是树林,从珠江划船可以经新河浦小河直达门前。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带的房子都收归国有,20世纪90年代落实华侨政策,在手续齐备的前提下将房屋归还原主。目前作为展馆开放的是24号,是2006年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回来的,22号现在仍是私人住宅,26号是一家幼儿园。现在春园



春园(新河浦路24号)中共中央办公旧址



中共三大会址旧景

24号的陈设,大至床铺、书柜,小至茶杯、报纸,都具上世纪20年代的时代特色。家具多为酸枝木质地,每个楼层都摆放着仿真的《广州民国日报》,在三楼马林的住所客厅,还摆放着一台古老的留声机,据说马林整天都要听音乐。

离春园走两分钟路程,就可到恤孤院后街31号。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此召开。会前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受大会委托,租赁了这座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简陋房子。为了保密,当时特意选在一偏僻幽静处,档案也没有记载会址,房子在抗日战争期间又被日机炸毁了。以致很长时间三大会址成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谜。

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调查三大会址小组。陈独秀、毛泽东等代表居住的春园,毛泽东与谭延闿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的培正路简园,以及会址对面瓦窑街的逵园,成为寻找三大会址的坐标。最后确认恤孤院后街31号为三大会址,1979年12月会址被定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1日,重建后的三大会址和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由于三大旧址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没有相关建筑图纸,所以重建时旧址没有复原旧貌,而是建成了广场;广场西边,是红砖外墙的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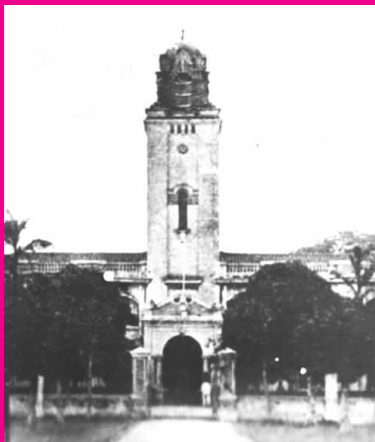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以湘区的党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三大。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

国共合作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章指出当时中国有三种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文章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中国反动势力太大了,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把总的社会力量划分为三派,并一直沿用下去,是毛泽东处理政治和革命问题的一种独特方法。中共三大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

毛泽东对国内政治格局的理解和他在湖南开展的工作,令人刮目相看。中共三大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党的一切函件必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东山文明路215号钟楼礼堂、惠州会馆

东山区文明路215号的钟楼建于1905年,最初为清代广东省科举考试的场所——贡院的大院,1908年改为广东优级师范学堂。钟楼为砖木结构,楼顶



(上)惠州会馆

(左)东山区文明路215号的钟楼



四面装置时钟,故名“钟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钟楼底层的礼堂召开。钟楼大院前面的广场占地17400多平方米,是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领导人经常出席群众集会的中心场所,因而被誉为“革命的大本营”。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及大会后,孙中山曾多次在广场的高台上发表演说。省港罢工的集会、纪念列宁逝世的周年大会、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追悼廖仲恺的大会、广东统一庆祝大会、欢送北伐军出师群众大会以及欢庆北伐胜利大会,均在这里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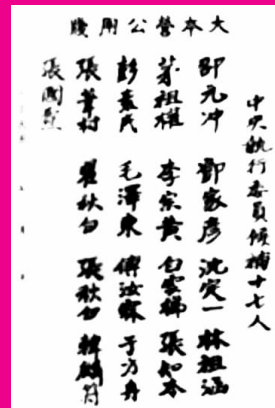
1924年1月,毛泽东同国民党的部分代表乘船离开上海到广州,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大会期间,毛泽东住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办公地点惠州会馆,即现在越秀南路上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这里离钟楼不远。毛泽东就住在这座米黄色的欧式洋楼的二楼。

毛泽东参加大会的座位是39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在章程中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当即遭到李大钊的驳斥。廖仲恺等人支持李大钊的观点。毛泽东适时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所否决。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这种选举制度给一些小党以较大的生存空间,在当时采用这种制度,可以保护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毛泽东发言反对这个议案。他认为,实行比例选举制会给破坏革命的少数派以机会,是有害于革命的,因此不能讨论,不能表决。最后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1月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其中就有毛泽东。毛泽东对孙中山是充满敬意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撰文指出: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步出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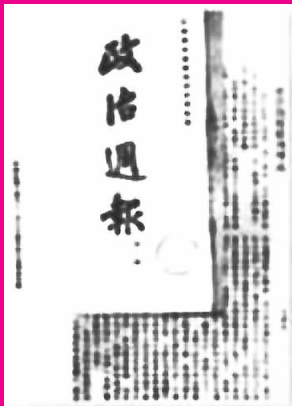
孙中山手书的名单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晚年时,毛泽东依然记得在广州时听孙中山讲话的情景,他说,孙中山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一片掌声。一个是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革命家,一个是未来的革命领袖,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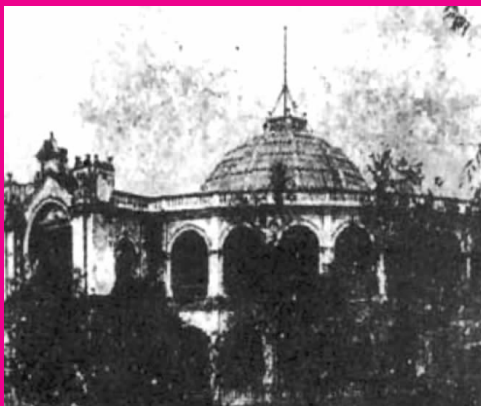
1月30日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幕词,他说:这次会议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输入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东山庙前西街38号、中山四路42号

1925年9月,逃离赵恒惕抓捕的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赴广州。他们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株洲,后改乘轮船到衡山,然后翻越五岭,到了广州。他这次在广州,是他建国前在广州生活、工作时



《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编辑部旧址

间最长的一次。

毛泽东开始住的地方在惠爱路(今中山三路)东皋大道。1925年冬天,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来广州,全家就搬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座简陋的坐东向西的两层楼房,楼上的人一走动,便有“吱吱”的响声。毛泽东的同事萧楚女、沈雁冰(茅盾)先后在一楼住过,毛泽东一家住在二楼。二楼有一大一小两间睡房和一个客厅。大房间是毛泽东、杨开慧的卧室,小房间是杨母和孩子卧室。床是由两张条凳支撑的木板床,客厅只有几张凳子和一张放置茶壶、茶杯的桌子。毛泽东担任主编的《政治周报》的通讯处也设在这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前馆长黎显蘅从茅盾口中得知,这座小楼房后来被拆掉了。

毛泽东到广州后不久,被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推荐代理宣传部长一职。在主持宣传部工作中,毛泽东更深刻地了解到当时国民党内的思想纷争。国民党右派正在加紧分裂革命的联合战线,攻击联合战线中的共产党;有人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对此,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存在着左翼和右翼，无产阶级要联合与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左翼合作，而中产阶级的右翼则应当打倒。毛泽东用他的笔，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就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的简陋楼房里，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劈头就提出了两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

但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及其毛泽东的回答，并没有得到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把文章的初稿送给他们审看，陈独秀拒绝在党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文章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到编辑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时，这篇文章被选为开卷之作。

除了分清敌友外，毛泽东还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把亿万农民作为革命的真正朋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农村去。这个观点形成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观点的形成不过是当时革命格局发生变化的反



番禺学宫



应:农民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毛泽东本人就是农民斗争的积极组织者。

这次在广州,毛泽东还担任过一个重要职务,就是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国民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800名农民运动干部。1926年5月到9月期间,毛泽东主办了第6届,地点在番禺学宫,现在的中山四路42号。

番禺学宫原本是番禺县县学和祭祀孔子的文庙,建于明洪武3年(1370年),现在的格局形成于清乾隆12年(1747年),与德庆学宫、揭阳学宫一道,同为广东三大学宫。1953年,这里辟为农讲所旧址纪念馆,馆名是周恩来题写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同志主办
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纪念馆”,馆名为周恩
来所题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广东省吊唁的灵堂就设在这里。据说,最近几年,每年都有20多万人到这里参观。

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招收了327名来自20多个省的学员。这一届农讲所共设25门功课,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周恩来是这一期的教员之一,负责讲授军事课程。这也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共事的开始。毛泽东自己兼任“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课程的讲授。毛泽东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生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还要了解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对政治的影响。期间,毛泽东还组织师生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心海丰实习了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看法。

9月11日,有318名学员顺利通过了农讲所的毕业考试。他们考试的题目一共有6道:第二届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意义在哪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是否即为民生主义的实行?农工运动的决议案中所举的各项具体议案与民主主义有何关系?你若站在严格的党的纪律和忠实的立场上怎样评判西山会议?中国国民党组织最主要的精神在哪一点?何谓党团,怎样运动党团?所关注的都是当时现实的政治问题。

在这期间,毛泽东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他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走到了前列。

送走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不久,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会书记。1926年11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回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毛泽东再一次到广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2. 还是农村问题

东山小岛1号楼

1954年11月,毛泽东到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来广州。此后到1961年,他来过8次广州。

建国后毛泽东到广州,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东山小岛1号楼。这里曾经是孙科的别墅,房屋及装修都不豪华,但周围环境非常好,面对珠江,有散步的地方,很安静。毛泽东1954年来时,小岛招待所还没有建起来,仅有两栋房子。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77人和随行人员182人从北京乘专列到广州,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接待成了大问题。毛泽东住小岛,别的中央领导,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没法在小岛上住。他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毛泽东在小岛开伙,刘少奇在陶铸家开伙,其他的领导都是到广东省的负责同志家搭伙,其余的人开大伙,吃大锅饭。

毛泽东喜欢游泳。1954年来广州时,虽是11月份,但还是很热,只能穿单衣。他就提出要到珠江游泳,因为河水脏,担心有血吸虫,被劝阻了。毛泽东只好在每日下午的会议空隙时间,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

1956年5月毛泽东来广州时,再次提出到珠江游泳,警卫人员又搬出安全问题劝阻。毛泽东说:“我现在与资产阶级一样嘛,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终于说服了警卫人员。毛泽东搏击着江水,高声呼喊:“我自由了!”他回头一看,见不熟水性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还在船上,就打趣说:“你们两个人,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局长,天天说保护我,现在我在水中,你们却在船上,要是我淹死了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了小船,正碰上薛焰,大概是想起了两年前的事,拍了拍自己的肚皮说:“你看,我的肚皮这

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说得大家都笑了。这一次毛泽东在广州29天,到珠江游泳12次。

考虑到毛泽东冬天在广州没法游泳的问题,广东省决定在小岛修建一个室内游泳池。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修建楼堂馆所。游泳池修好后,毛泽东未在此游过一次泳。陶铸为此在北京、广州召开的数次中央、省委会议上作检讨:“我们在错误的时间(1960年困难时期)、错误的地点(小岛游泳池是在水塘上填沙建起来的)修了个错误的房子(属楼堂馆所)。”

棠下村

毛泽东来广州,或参加会议,或深入城乡搞调查研究,或研读论著,或撰写文章。或许是在延续几十年前主办农讲所时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建国后来广州,考察、思考得最多的还是农村问题。

1955年12月来广州,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把广东的9篇



毛泽东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州市长朱光陪同下,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



文章选进该书,并为广东省的中山县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合作社、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阳江县边海农业生产合作社、台山县田美村农业合作社、广宁县江怖乡红星生产合作社的6篇文章加了按语。主编这本书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兴奋的,广大的中国农村,几亿中国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正是他致力于农民运动所要追求的目标吗?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的群众运动来推动。1958年4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广州。4月15日,他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文章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后,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了新的高潮。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陶铸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社。知道是毛泽东来村视察,村民们像过节一样等候着他的到来。省市领导正要把社干部介绍给毛泽东认识时,几百个热情的农民却一下子围拢上去了。当时的棠下农业社社长钟叙本回忆,“毛主席对人很亲切”。他清楚记得毛泽东当年来棠下的时候是65岁。“毛主席问我年龄多大,我回答26,他说我不像,看上去更成熟一些。我就问主席‘那您呢?’,他回答‘65’。”在棠下农业社简陋的办公室里,毛泽东逐一询问了该社干部的姓名和年龄,又详细了解早稻、副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并同社干部一起到田间实地考察,参观干部的试验田,他对该社的工作表示满意。

第二年,广州市教委根据毛泽东视察棠下的过程,编写了一首《毛主席到棠下》的诗:“毛主席到棠下,贫下中农心里乐开花。主席紧握我们贫下中农手,说的都是我们的心里话。一问合作社怎么样呢?铁打的江山永远不会塌

……”这首诗还被编入广东省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

毛泽东在棠下一个小时的逗留，使这个原不起眼的村落一下闻名全国。毛泽东视察后，棠下村便和韶山结成友好村，棠下小学也和韶山小学结成友好学校。后来，棠下人建起了“毛主席考察棠下纪念馆”。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旧址却一直保持着原貌，2002年，为了迎接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村里出资20多万元对旧址进行了第三次较大规模的重修，但依然按当年视察时的原貌布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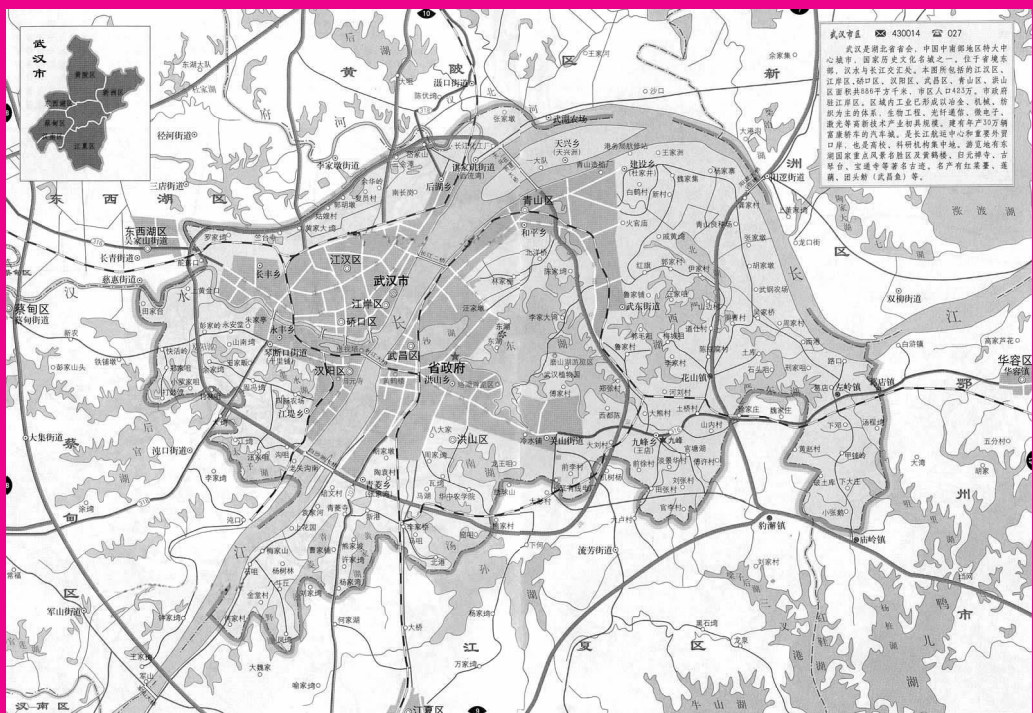
毛泽东视察棠下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不幸的是，他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问题，农村人民公社中一平二调、浮夸风等问题大量暴露出来。毛泽东试图解决这些问题，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会后，他带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进行农村调查。2月下旬，三个调查组汇合广州，毛泽东听取了成员的汇报后，召集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到广州，就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毛泽东指出必须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是他根据三个调查组的调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也成为他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农业六十条”）的核心和基石。随后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这一条例。这次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

当然，探索彻底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道路，要比毛泽东当时设想得要漫长得多、艰难得多。毛泽东的探索显然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农业问题的新思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巨大变革。毛泽东曾经视察过的棠下村，1999年经上级政府批准撤销棠下村民委员会，成立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如今的棠下村共有大小企业300多家，15个经济社（即



原来的生产队)都建了现代化的村民公寓,每户都拥有1个单元以上的楼房,土地也折价入股了,每个劳动力年终都有1.6万元以上的分红,村里公、私汽车更是达两三百辆。

但经历过毛泽东视察的棠下村老人们,仍然时常回忆起那段幸福时光:毛主席当年到棠下,贫下中农心里乐开花。主席紧握我们贫下中农手,说了多少知心话……。钟叙本说,越来越富裕的生活是纪念毛主席的最好礼物。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辛亥革命使中国革命进入到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革命中擎起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毛泽东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五、武 汉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武昌起义不久，一位革命党人来长沙，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起义的情况。在这所中学读书的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四五天后，他决定投笔从戎，去武汉参加革命军。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穿雨鞋，毛泽东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的朋友那里借鞋。但他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这时长沙也发生了起义，第一次去武汉的计划就这样取消了。

后来，从1918年8月到1974年10月，毛泽东先后有40多次来到武汉。

1. 路过武汉

李白在诗中写道：“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城”武汉襟江带河，交通便利，是“九省通衢”之地。经武汉可以东去上海、北去北京。1918年至1922年5年中，毛泽东在去北京、上海和返湘途中，曾5次路过武汉。

1918年8月16日，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他们先坐船到武汉，然后从武汉乘火车去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请愿团赴京请愿。

张敬尧，北洋皖系军阀，1918年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主政湖南期间，纵容士兵烧、杀、淫、掠，作恶多端，湘人曾书对联“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揭露其罪恶。“尧舜禹汤”指的即是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恽代英

四兄弟。1919年12月3日,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开会,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常德、衡阳等地扩大驱张宣传。6日,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湖南学联公开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驱张誓言。

这次赴京请愿,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在汉口将《驱张宣言》秘密寄往各地,争取各界支持。之后,毛泽东从武汉出发,到上海送蔡和森等人赴法留学去了,12月18日到达北京。第二年4月11日,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5月5日到达上海,7月初,第三次到达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神交已久的好友恽代英。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武昌,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是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主将。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进步团体互助社,没过多久,毛泽东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在这以后,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将刊物寄给恽代英,请为代售。1919年6月,湖北督军王占元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酿成了六一、六三惨案,恽代英写了《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将惨案真相公之于世。文章写好后,恽代英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全文刊载了。

1920年初,经恽代英倡议,互助社、日新社和健学会等团体联合一起成立了利群书社。毛泽东到武汉后,便去武昌横街头的利群书社拜访恽代英。两人交换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意见,商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及与利群书社

加强联系等问题。回长沙后,毛泽东主持创建了文化书社,他在长沙《大公报》上撰文介绍文化书社的缘起时说:“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恽代英为文化书社购进了大量的进步书刊。两个书社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下,成为当时长江中上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1921年和1922年,毛泽东又有两次去上海时路过武汉。一次是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另一次是为湖南劳工组织创始人黄爱、庞人铨被害事,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这次到武汉,毛泽东住黄土坡26号中共武汉区委机关,停留1周多,同陈潭秋、黄负生等谈及黄庞事件,并讨论劳动运动的方式和京汉铁路工人与粤汉铁路工人联合的问题。

陈潭秋、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陈潭秋是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对他并不陌生。陈潭秋1943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由于消息隔绝,1945年中共七大时,陈潭秋仍被选为中央委员。黄负生1920年加入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曾把他与蔡和森相提并论: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在利群书社与恽代英晤谈。图为位于武昌横街头的利群书社遗址



1922年3月毛泽东返湘途中到武汉,图为毛泽东到过的位于武昌黄土坡27号的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机关旧址



陈潭秋

“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这次毛泽东到武汉时,黄负生正患病在身,不久病逝,年31岁。在中共七大上,黄负生被追认为烈士。

毛泽东5次路经武汉,停留时间虽然短暂,但通过与恽代英、陈潭秋、黄负生等人的接触,交换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的情况和经验,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在毛泽东还只是个为一双雨鞋发愁的中学生时,对武汉的向往,反映了他对旧式民主革命的追求。而在真正来往于武汉时,毛泽东与恽代英谈论的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陈潭秋、黄负生谈论的是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地理空间没有改变,但时间已经变迁,中国革命也进入到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革命中擎起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毛泽东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2. 寻路

1936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到农村中寻找革命潜力,是在1925年五卅事件后。

五卅运动后,毛泽东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湖南、湖北和广东之间,三省正是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毛泽东的工作和思考的重点,也开始转向农民运动方面。五卅事件发生时,毛泽东正在韶山组织农民运动。1925年9月他去了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赴长江沿线视察各省的农民运动,1926年12月初到达武汉。除中间两度去湖南外,毛泽东在武汉一直工作到



1927年8月中旬。期间，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他还担任过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等职，都与农民运动有关。

毛泽东在武汉的几个月，正是国民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的时期。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组织农民运动的实践，使毛泽东敏感地注意到，土地和武装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这一认识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都府堤41号

毛泽东在武汉时，曾住过都府堤41号。

都府堤位于武昌解放路北段的西侧，其东原有司湖，清时在此筑堤，堤近都督府衙门，故名督府堤，亦称都府堤。清代末年，沿堤形成居民区，叫都府堤大街，人们沿旧习，仍称之为都府堤。都府堤41号，靠近长江边，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南风格民居，有436平方米，青砖黑瓦，三进三天井。除毛泽东外，蔡和森、彭湃、夏明翰、毛泽覃等都在这里临时住过，这里还是中共中央农委所在地，但建国后被当作普通民居拆除了。好在房东的儿子是武汉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记得房子的结构，政府方面还请来在这住过的夏明翰夫人、毛泽覃夫人和毛泽东家当时的保姆陈玉英等，根据她们的回忆对都府堤41号



1927年的毛泽东



图为毛泽东及全家
1927年上半年在武汉居住
的武昌都府堤41号



都府堤41号卧室

进行了重修,1967年辟为纪念地。

1927年2月底,怀有身孕的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两个孩子的到来,增添了家庭的温馨。不久,毛泽东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这使都府堤41号更加热闹了。除了家人团聚

外,各省农民协会的负责人经常来这里汇报和商量工作,后屋饭厅常常有两桌人吃饭。

陈玉英是1926年冬到1931年春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家请的保姆。刚到武昌时,她自己是湖南宁乡口音,不懂武汉话,又不识字,有次上街走错了路,转了好久才回来。毛泽东知道后特意为她写了一个小布条,“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陈玉英”。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时,她也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表现很坚决,没有屈服,毛泽东对她的气节十分钦佩。1957年,毛泽东写信给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寄去300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身居要职,未忘贫贱之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从广州到上海,然后转赴武汉,恰巧在船上碰到了毛泽民。他们到武汉后,很快找到了毛泽东。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兄弟三人聚集在都府堤41号。一家人围在方桌旁,以打麻将做掩护,分析当前的形势。毛泽东告诉杨开慧和两位弟弟,现在情况很危急,要求他们尽快转移。八七会议一结束,杨开慧就先回湖南去了。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也于8月12日离开武汉去了长沙。



都府堤41号为世人所知,还与毛泽东的一篇著名的调查报告有关。

毛泽东在武汉工作时期,曾于1926年12月和1927年6月两次回到湖南。第一次回湖南时,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在考察的基础上,毛泽东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国后一段时间,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地点,湖南与湖北的研究者曾争执不下。1959年毛泽东回长沙时,就这个问题湖南有学者托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问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是:武昌都府堤41号。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大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对于当时的革命,报告中有一段经典的描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武昌红巷13号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中央局的批准。《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5县的农民运动后,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扩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生规模,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提议得到批准。1927年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1927年4月4日,农讲所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代表百余人,还有国际工人代表团。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和美国代表白劳德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

农讲所旧址是离都府堤41号约200米远的红巷13号。

红巷13号是目前武汉市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学宫式建筑,建于1904年,由四栋砖木结构的房屋组成,中间有一个大操场,占地面积12850平方米。它最初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北路学堂,后又成为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的校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这里又成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基地。如农讲所的开学宣言中说的,农讲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复原旧址纪念馆,周恩来题写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馆名,1963年修复开放。

从1927年3月至6月,农讲所共培训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全国17个省的学员739人。毛泽东是农讲所3位常务委员之一,实际负主持之责。毛泽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亲自选聘教员,并亲自授课。讲习所共设28门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毛泽东讲授了“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还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汉俊、何翼人、李达等,都曾在此任教。

农讲所强调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农讲所的《规约》中写明:为将来发展



武昌红巷13号庭院



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枝汉阳造七九式步枪，军事训练每天2小时，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每天增至4小时。

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员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到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如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黄麻起义以及参与创建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实践者。



开学典礼那天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门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学员的毕业证章



都府堤20号

鄱阳街139号

离都府堤41号仅20米远的都府堤20号，原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此举行。毛泽东是大会的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毛泽东与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议定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议案提交大会，但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在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的背景下，大会把希望寄托在了汪精卫的身上。然而，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像中共五大希望的那样去革命。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制定的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也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

30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1927年的春天，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把压抑沉重的心情凝结在《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里：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到当时的政治局势时说：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毛泽东最初接到的命令是去四川，但他说服了陈独秀，改派他



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6月下旬,毛泽东奉命去了湖南。毛泽东到湖南后,到衡山召集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可能还有无数个叛变革命的事件在全国发生,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了。但10天后,陈独秀指责毛泽东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命令他立刻回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终于撕下了假面具,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并叫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个漏网”的疯狂口号。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100多人惨遭屠杀。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成了通缉犯。

开始有共产党员声明退党、叛党。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地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

中国革命处在十分紧急的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



(上)八七会议会议室

(左)汉口鄱阳街139号(原三教街41号)
八七会议会址



以寻求对策。

八七会议的会址位于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街139号。这幢临街的三层西式楼房，是1920年英商罗惠公司修建的公寓。八七会议时，楼下是一个印度人开的小百货店，楼上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派驻国民政府顾问的住宅。会议就在住宅二楼靠后面巷子的一间房里召开的。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1982年，邓小平题写了馆名。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及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共21人。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参加了会议。由于形势险恶，参加会议的人分3天由交通员分批带进会所，到后吃住都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分批撤走，一进一出花了6天时间。而会议只开了1天就结束了。

八七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提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发言中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作军事运动，不作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作军事运动，专作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政治局常委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

八七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的意见，建议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童年时游泳的池塘

3. 大江东去

早些年,韶山南岸池塘边竖着一块铁牌,上书:“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游泳过的池塘。”1963年11月,郭沫若参观韶山时,指着这口塘说:“毛主席是小时游池塘,老年游长江啊!”

毛泽东一生游长江40多次,除了1966年7月16日的渡江当时公开过外,其余的都是在消息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毛泽东第一次游长江是1956年5月31日。当时具体负责毛泽东安全保卫工作的谢群滋回忆,当车子到鲇鱼套时,毛泽东突然叫司机停车,说:“我要游水。”开始大家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毛泽东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我要游水”,而且语气很坚决。当时武汉还潜伏着为数不少的国民党特务,陪同人员都一齐劝毛泽东不要游,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也来劝阻。但毛泽东一旦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

保卫部门火速抽调人手,布置安全保卫工作。他们从湖北省体委调了20名政治过硬、技能体能出众的运动员来护游,同时在游泳点增派警卫,又派人找了10条小划子,在江面上从两旁保护毛泽东。

毛泽东这次游长江是从武昌造船厂下水的,后来他又有13次从武昌造船厂码头登船下水游长江。200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高3.5米、重达7吨的毛泽东汉白玉塑像在武昌造船厂落成。塑像展示了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身着睡衣向职工致意的潇洒闲适的风采。塑像前面翻开的大理石书卷中,记录了毛泽东接见职工情形和14次游长江的时间表;塑像后面是一堵长18米、高1.8米的大理石题词墙,上面镌刻着毛泽东1956年游长江后写下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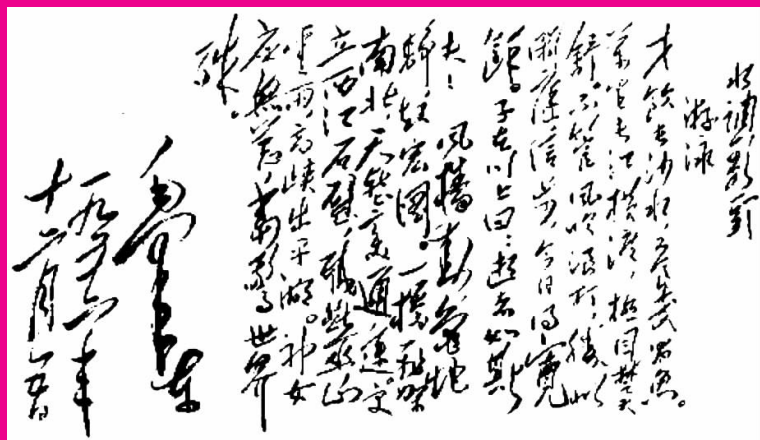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手迹:《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第一次在长江中畅游了1个多小时,在武汉余家头附近岸边登船,随后用餐,菜中就有一道清蒸武昌鱼。武昌鱼就是鳊鱼,有窄鳊、宽鳊、团头鳊、红眼鳊等称呼。古来有岑参的“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马祖常的“携幼归来拜丘陇,南游莫忘武昌鱼”等诗句。毛泽东在词中自注:“三国孙皓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和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出口号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南京人心情如此;现在改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因为毛泽东的这首词,武昌鱼从此成了湖北的特色名品。

这首词初题“长江”,正式发表时改为“游泳”。毛泽东喜欢在长江中游泳,也向往到长江中最险要的一段三峡中去游一游。1963年6月,公安部九局指示武汉公安部门,要求做好毛泽东游三峡的准备工作。武汉公安部门,随即派人沿三峡两岸踏看,了解水情,搜集有关资料,并派一些游泳健将试游。试游者都是一下水就被急流巨浪卷走,好不容易才游上岸来。武汉公安部门由此得出结论:三峡地带不能游泳。并立即将报告密报党中央和公安部。周恩来和朱德都看过报告,周恩来派罗瑞卿到武汉了解相关情况。后来政治局决定,毛泽



1953年视察长江,毛泽东听取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
林一山有关建设三峡大坝设想的汇报

东不游三峡。

没有游过三峡的毛泽东,一直怀着改造三峡的梦想。早在1953年2月,在从武汉起航的“长江”舰上,毛泽东谈到了对三峡治理与开发的设想: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1956年,三峡勘测科研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毛泽东把他对三峡工程的决策,写进了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毛泽东把三峡工程称之为千年大计,主张三峡工程要尽量在有利无弊的前提下进行。1970年底,中共中央研究了葛洲坝工程的兴建问题。197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提请毛泽东批示的报告中,说明:“修建葛洲坝工程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12月2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第一次游长江后,对陪同他的李先念说,以后我每年都要来游长江。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是1966年7月16日。他这次游过长江后登上的快艇,

后来改名为“716艇”。

1976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这次畅游长江10周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J10《到大江大海去锻炼》邮票1套3枚。现在每年的7月16日成了武汉人横渡长江的节日。

这天武汉正举行有近5千人参加的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上午9点20分,大江两



为纪念毛泽东1966年7月16日游长江发行的J10邮票,分别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万里长江横渡》、《到大江大海去锻炼》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



1966年7月16日，
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后
登上“716艇”

岸的扩音器开始播放《东方红》。宽阔的江面上，游泳者有的高举红旗，有的推着高大的毛泽东语录牌，语录牌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73岁的毛泽东游了1小时零5分，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游程近30里。

7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这次游长江盛况。这篇报道最后说：“毛主席再一次踏破长江水、畅游天堑近30华里的壮举，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长江两岸一直持续了4个多小时。这动人的情景，表达了我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敬仰，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7亿人民放开眼界看未来，乘风破浪向前进！”

畅游长江的毛泽东回到北京，登上了天门城楼，向几百万热血青年深情地挥动起一顶军帽。他要以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再次掀起一场“革命”。



建国后,毛泽东1953年2月16日第一次来武汉。图为毛泽东赴汉口途中下车喜迎春雪

下图为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走下汽车时的情景



毛泽东到武汉,多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1号。梅岭1号在东湖边一片密林中,早春时节,红梅、白梅、黄梅竞相开放。1969年10月到1970年4月,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半年多,曾亲自从武汉大学珞珈山移来油松,栽在梅岭1号门前;门前的荒地,在他的建议下也变成了橘子园。

1967年7月毛泽东来梅岭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武汉群众组织分成以“百万雄师”和“工总”为首的两大派,派性斗争激化,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解决武汉问题,原定要两大派群众组织各选派代表到北京汇报的。后因毛泽东要巡视大江南北,改为两派代表不去京,问题就地解决。但由于谢富



治、王力等背地里四处活动,支持“工总”,压制“百万雄师”,引发了七二〇事件。7月20日清晨,一部分军民冲进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宾馆,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群众不知道毛泽东正住在东湖宾馆,堵住了梅岭的外部通道。最后毛泽东是乘飞机离开武汉的,走的时候很匆忙,梅岭1号门口的灯也没开。“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此,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这次毛泽东到武汉本计划再次横渡长江,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只好作罢。从此毛泽东再也没有游过长江。大江依然滚滚向东,但毛泽东已经老了。



江西是毛泽东一生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更是留下他革命印迹极重的地方。毛泽东一生最艰难，最苦闷的时期是在江西度过的，但他一生的辉煌事业也是在江西奠基的。他在这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六、江西

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西是毛泽东一生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从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有的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江西更是留下毛泽东革命印迹极重的地方,民主革命时期,他在这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1953年他来九江视察,鼓励江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掀起了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的高潮。

1. 上井冈

毛泽东一生都保持着自幼形成的许多农家习性以及农民式的外在气质和内在的思想性格。农家文化对毛泽东人格精神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孕育铸造了他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的文化性格。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最初致力的也是工人运动,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中心论,既是中国革命格局发生变化的反映,也是他实践理性精神发展的结果。

从安源到井冈山,正好反应了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变化历程。

安源

1967年10月1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

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中,展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学生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表现的是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画中的毛泽东穿着长衫,头稍稍扬起,颈部稍微扭转,左手紧握,右手挟一把雨伞。该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风靡一时,共印9亿多张,超过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数;而且还用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像章。当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恩来住室里唯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这幅画。

但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既不是穿着长衫,也不太可能是步行。毛泽东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这是他自己说的。毛泽东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着去安源,是江青接见学生代表时说的。江青的说法可能只是她的一种想象。毛泽东到安源时,粤汉铁路(广州市到汉口)和株萍铁路(株洲到安源)均已开通,每天有兩列运煤的火车在安源和长沙间往返,并在运煤列车上挂上几节客车车厢,交通便利。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不可能知道火车可以直达安源,还中途在萍乡县城下车,再一步步走路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年10月下旬,他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在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1个多月后毛泽东与李立三等人再去安源。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征友,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应。李立三就是那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半个朋友”。1921年11月,李立三从法国



勤工俭学回来，他拿着中央的介绍信去见湘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见面后，两人都很高兴，毛泽东说“洞庭有归客”，李立三回答“潇湘逢故人”。这次他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的身份，去指导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他们决定将“安源这锅冷水烧热”。后来从俄国留学回国的刘少奇也加入到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工作中来。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密切合作的一个开始。

安源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最早崛起的地区之一，19世纪末，安源引进西方资金和先进技术采煤炼焦。后来，安源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是汉冶萍公司的主要企业。早在1906年，安源工人就积极参加了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首开中国工人阶级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先河。毛泽东他们来时，安源



李立三



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

路矿有1万7千多名工人。他们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以很快开展的地方。

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三位年轻的湖南籍革命家,在安源先后创办了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矿工合作社和剧社,筹划罢工运动。毛泽东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总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罢工运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罢工取得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后,毛泽东又在湖南领导一系列工人罢工运动。他领导的工人运动,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失败1次,引起社会瞩目,也获得党内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的工作时,这样说:就地区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7年9月,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第7次来到安源,这次他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秋收起义军事会议”的。会议确定分兵三路,从赣西的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铜鼓方向为主攻,安源地区则以工人和矿警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采取包围之势。秋收起义最初走的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

9月6日,毛泽东身穿白色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从安源出发,赴铜鼓指挥起义。9月23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南撤退时,经过安源。1930年9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又来过一次安源,有1千多工人农民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红军。安源是毛泽东从事以工人为主力、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的起点,差不多也是终点。



三湾

在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毛泽东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直到离民团总部不到200米的地方,才找到机会往田野里逃。他后来回忆:“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了日落。士兵们在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当他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这是秋收起义发动前毛泽东的一次危险的经历,但这次历险显然没有打断他发动起义的决心。1927年9月9日,起义爆发。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是划断时代之笔。在此之前的革命军都号称国民革命军,打的旗号是国民党旗号;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和共产党旗号的,这是第一次。

但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湘赣边界群众也未充分发动的形势下,起义很快受挫。毛泽东决定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退往湘南。这个决定,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南下,一路艰辛。由于作战频繁,疟疾流

行,伤员、病员加多,部队减员严重,军纪松弛。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离队自寻出路。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9月29日到达三湾村时,部队不足1千人。

三湾位于江西永新、宁冈、莲花、茶陵4县交界的九陇山北麓,距永新县城39公里,当时只有28户人家,170多人,且居住相当分散,是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山村。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宣传,群众陆续回村。



三湾士兵委员会的旧址



三湾枫树坪

9月29日晚,毛泽东住进了村民经营的泰和祥杂货店。他正准备躺下睡觉时,偶然瞥见货架柜顶上放着一摞落满灰尘的书。原来是一套线装本的《三国演义》。毛泽东如获至宝,当晚便在昏暗的光线下读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便向店主借阅。这套《三国演义》伴随着他度过了在三湾的空暇时间。泰和祥杂货店后来被国民党烧毁了,1961年重建后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三湾改编纪念馆”已经开馆。

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店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有: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建立党的各界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内部实行民



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这次改编被称之为“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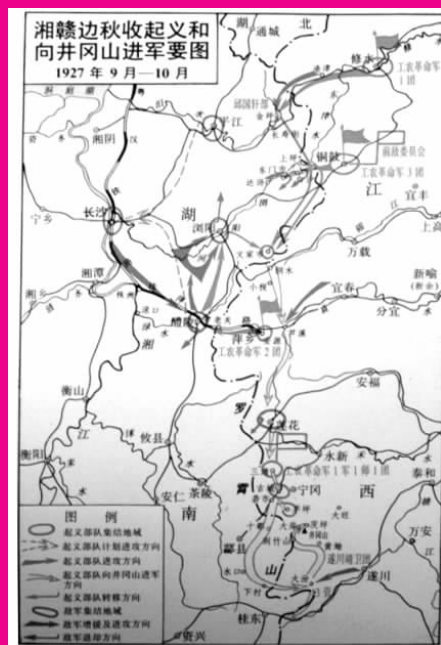
第二天,毛泽东在三湾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有关改编的决定,并作动员讲话。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人,十个可能当他一百。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延安时,毛泽东对斯诺说,这支部队中,有许多人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他列举了时任军团政委的罗荣桓和任军长的杨立三。

部队在三湾住了5天,是起义以来最从容的一次休整。在三湾,为建立落脚点,毛泽东给袁文才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派三湾村的一个农民送到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很快,龙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来到三湾。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毛泽东对他说明工农革命军的主张,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离此地30里的古城。

10月3日,毛泽东率部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毛泽东在枫树坪再次向干部战士讲话,并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当晚,部队进驻古城。

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4县之交,总面积约4千平方公里。这里山势高大,地形复杂,主要山峰海拔多在千米以上,最南端的南风面海拔2120米。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井冈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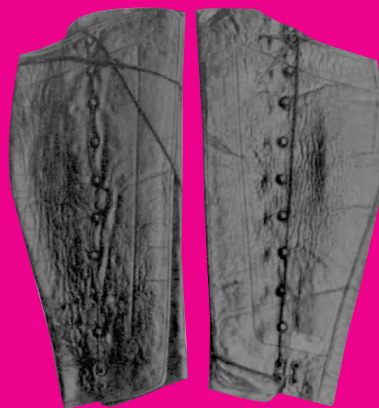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井冈山烈士陵园内的王佐塑像



井冈山烈士陵园内的袁文才像



毛泽东送给袁文才骑马用的皮裹腿



茨坪毛泽东旧居

新、遂川三县输送。毛泽东说,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陈伯钧后来回忆,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打击敌军。

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在工农革命军来到之前,宁冈的茅坪有一支以茅坪人袁文才为首的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它与驻在井冈山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的另一支王佐的农民武装,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毛泽东率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后,确定了对这两支农民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10月27日,上井冈山,到达茨坪。

茨坪现在是井冈山市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接待中心,当年是井冈山上最大的一个村庄。

现在茨坪的东山脚下,风姿秀丽的挹翠湖对面,陈列开放的革命旧址共有7处,均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就有毛泽东茨坪的故居。

毛泽东在茨坪的故居原是一家商铺,进门右首侧是一个小柜台,后面是一个木制货架;房屋的右后间就是毛泽东的住所,坐东向西,大部分时间没有阳光。当年毛泽东与贺子珍来往于茨坪、茅坪、永新等地,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1928年11月,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井冈山斗争》。



油画：井冈山会师（作者：何孔德）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旗

毛泽东率部退却到井冈山时，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派代表周鲁到井冈山，贯彻执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和给湖南的特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湘南暴动。

工农革命军暂时丢掉了井冈山，但毛泽东率部队到达湖南酃县后，没有直接去湘南。不久，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动的湘南暴动失败。



黄洋界上的纪念碑



朱德率主力部队北退，毛泽东率部队在酃县县城阻击湘军对朱德部队的追击。这是两位红军领袖的最初军事合作。4月20日前后，毛泽东与朱德在酃县初次晤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后来朱德与尼姆·韦尔斯说，“这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会面”。2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两支革命军队在宁冈砦市会师。5月4日，会师庆祝大会在砦市举行。大会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等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此外，毛泽东还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挎上了匣子枪，说：“挎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随后他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这是他平生少有的身背武器的历史记载。

从此“朱毛”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也一起名震天下。在当时，即便是穷乡僻壤的土豪乡绅们，也有许多人知道“朱毛”。不过，他们所了解的还只是：“所谓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现在到井冈山，依然能感受到“朱毛”的不可分。在黄洋界，可以看到横竖两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横碑的一面镌刻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另一面镌刻着朱德的亲笔题词“黄洋界”。竖碑的一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一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

黄洋界在茨坪西北面17公里处，海拔1343米，群山巍巍，地势险要，时常弥漫着茫茫云雾，好像一望无垠的汪洋大海，故又名“汪洋界”。又传说古时在这里靠宁冈方向的村庄住的是姓黄的当地人；靠井冈山这边的村庄住的是杨姓客家人。为了互不侵犯，两村的人在中央立了一块石碑为界，名为“黄杨界”。因为这里属万洋山的分支，又因“洋”和“杨”同音，后来又写作“黄洋界”。毛泽东喜欢黄洋界，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乘车从茅坪到茨坪他一路都未下车，即使车过八角楼，也只隔窗眺望一番。独有车临黄洋界才招手停车，驻足



①



②



④



③



⑤

①八角楼的天窗

②茅坪八角楼毛泽东故居

③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使用的油灯

④1936年,毛泽东同井冈山时期的部分同志在陕北合影

⑤1937年5月,毛泽东同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环视。毛泽东三首写井冈山的词,都提到了黄洋界。

井冈山五大哨口以黄洋界哨口最为著名,还因为这里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保卫战。1928年7月初,朱德和毛泽东分别率红四军主力下山袭敌。留守井冈山的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4个团的猛烈进攻。8月30日下午,红军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敌人集结攻山的部队轰击。当时只有三发炮弹,不料前两发炮弹都因受潮没有打响,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

所幸的是,最后一发终于在敌群中炸开了。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经回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说黄洋界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挥笔填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辗转读到了这首词。他对地下党员冯雪峰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后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把鲁迅的这个评价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

从茨坪经黄洋界,北行36公里,就可到茅坪。茅坪是秋收起义部队第一个相对稳定的落脚点,第一座红军医院就设在这里,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都曾设在这里。边区的两次党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毛泽东也常在这里居住和工作。

毛泽东在茅坪住八角楼。八角楼是一座悬山式二层人字顶砖土结构的楼房,房间屋顶木质结构很容易着火,因此设计了个八卦造型的天窗,以驱邪避魔,八角楼也因此得名。八角楼原是谢氏慎公祠,前面是谢氏家族的祠堂,后

面是当地名医谢池香的住房。到茅坪时,由于长途跋涉,毛泽东的脚受伤溃烂,袁文才因此将他安排在谢池香家中居住。红军离开后,国民党烧毁了茅坪的大部分建筑,因为八角楼是祠堂才得以保留。

八角楼一楼是毛泽东当年开会的地方,他住在二楼,经常在这里工作到深夜。为了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概括,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这是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文章首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预言,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1961年,茅坪八角楼毛泽东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八角楼,一盏青油灯还按当初的样子摆在书桌前。到这里,人们会向你讲起一根灯芯的故事。当年,根据地的条件异常艰苦,红军有一条关于使用油灯的规定,按规定,毛泽东是可以点三根灯芯的,但他一直用一根灯芯办公、看书、写文章,常常忙到深夜而不眠。茅坪的村民深夜经常可以看到八角楼里那昏暗的灯光。当年曾流传这样一曲红色歌谣:“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八角楼的灯光通通明;毛委员就是那掌灯的人,照亮中国革命的万里程。”后来有一支名为《八角楼的灯光》的歌,被广为传唱。歌中唱道:“深入农村扎下根,新中国孕育在井冈。”

2. 赣水苍茫

1929年1月1日,国民党方面集中3万兵力分兵五路进攻井冈山。面对如此形势,红军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由彭德怀等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赣南连同闽西,比起井冈山地区,同样群山环抱,

但人口要稠密,物产也要丰富,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瑞金

1929年2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经会昌进入瑞金。

瑞金在江西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东临福建,南通广东。在唐代末年时置有瑞金监,五代南唐时改为瑞金县,相传建制时曾从地下挖出金子,“金为瑞”,故称瑞金。瑞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是客家重要的聚居地之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更名为“瑞京”,成为中国“红都”。瑞金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红色记忆。周恩来说过,南京北京不如瑞金。聂荣臻给瑞金的题词是“永远值得怀念和敬重的红都瑞金”。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

苏区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先驻瑞金叶坪,后又转移到沙洲坝、云石山。

叶坪是一个村名,距瑞金城东3公里处。1929年2月毛泽东到瑞金时,最初就住在叶坪。这里现在已建成革命旧址纪念馆,进遗址大门,前行不足100米,左侧即为毛泽东住处。现有30多个国家部委都在叶坪的土墙建筑内找到了根。

毛泽东曾向斯诺这样介绍他的战术思想: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1930年12月25日,在宁都小布召开的反击第一次“围剿”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主席台两旁的



叶坪毛泽东故居,当年毛泽东常在这棵大树下看报读书

柱子上挂着毛泽东赶写出来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按照这种战术，1930年12月、1931年4月和9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写了一首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张辉瓒是“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发现张辉瓒的时候，他正躲在灌木丛里换士兵的衣服，裤子还没有来得及换上。这条裤子后来曾专门送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战利品展览上展出。张辉瓒被捉的消息传到了国统区，也传到了国外。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我在日本，我还记得很清楚，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是作为特大消息来报道的。”

毛泽东写好这首词时，国民党已集中20万兵力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第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二次“围剿”打退后,毛泽东再填词一首: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二次“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便开始筹划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这次他要亲赴江西指挥作战。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一次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蒋介石发出“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但3个月内,他这个誓言就被毛泽东打破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到叶坪与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把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范围扩展到28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长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有相当的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赣南会议)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上讲话



红井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叶坪的谢氏祠堂召开。如今的谢氏祠堂依旧保持着当年的原貌。这座典型的客家宗祠大约600平方米左右。当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10人。会议选出了63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全体执委在谢氏祠堂召开了执委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作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代表的任弼时提议：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的称呼从此叫开。

毛泽东在拥有了这个伴随他一生的称呼时，却迎来了他一生颇为失意的一个阶段。

1931年11月初，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会议指责红一方面军保持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全党要与之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领导。

由于叶坪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1933年4月，苏区首脑机关搬到了瑞



云山古寺内的毛泽东旧居

金城西3公里的沙洲坝,一直到1934年7月。

与叶坪一样,沙洲坝的村口也有一株几人才能够环抱的大樟树。毛泽东故居就在这古樟掩映之下,不远处,有一口用木栅栏围起来的“红井”,井边矗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沙洲坝的土全是沙子,存不住水,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沙洲坝三天不下雨,百姓没有水洗手帕,旱死老鼠渴死蛙,有女莫嫁沙洲坝。”毛泽东到沙洲坝后,发现村民都喝水塘里的水,就带着红军挖水井。开始当地老人反对,认为挖井会切断沙洲坝的龙脉。毛泽东告诉他们说,共产党人不迷信,出了什么事让龙王找我。战士和乡亲们很快挖了一口直径80多厘米的井,解决了村民的饮水问题。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几次将井填埋,但都被村民挖开。1950年,为迎接中央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瑞金人重新维修了水井,并取名为“红井”。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尽管3年以来毛泽东不断遭到批判和排挤,他还是当选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的职务只是荣誉性的,没有实权。在对大会的总结中,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从群众中寻找力量,是毛泽东一生的信念,也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

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局势越来越紧,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不时地来沙洲坝轰炸,中共苏区中央局等党、政、军、群首脑机关被迫从沙洲坝等地西迁至离瑞金城17公里的云石山,分散在附近的各个村庄。毛泽东住进了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庙门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当时,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就在这座庙里,毛泽东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写这本书,毛泽东是倾注了感情的,有几次,他把写好的东西让警卫员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他们看。

兴国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红三十团会师。不久蒋桂战争爆发,彭德怀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4月14日,毛泽东、朱德在于都为彭德怀送行,彭德怀返回井冈山,毛泽东率部队去了兴国。

兴国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年)称平固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以年号“太平兴国”为县名,至今已逾千年。兴国地处赣南北部,交通偏僻,境内多山,是国民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劳苦大众生活贫苦,渴望革命。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占青壮年的80%,为革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居全国各县烈士之首。在共和国开国将军中,来自兴国的有2位上将、5位中将与47位少将,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

兴国在几次反“围剿”中都是主战场。在中央苏区5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兴国先后组织军规模战斗11场,投入兵力20多万人次,歼敌4万余



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参加长征的12个主力师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均是兴国子弟。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达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

陈毅曾兼任过中共兴国中心县委书记,第五次反“围剿”中,陈毅在老营盘战斗中负了重伤,当地老表用简易的青竹担架将他送往红军后方医院。事后,陈毅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兴国人民用青竹杠子救回来的!”

周恩来用“中国外国不如兴国”来表达他对兴国赞誉。

毛主席则赞扬“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他亲笔题写的“模范兴国”巨匾,在兴国县城的四个城门上,一直高悬到长征前夕。

1929年4月到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7次来到兴国。

第一次来兴国时,毛泽东住在县城小井头的潏江书院。潏江书院砖木结构,占地面积4903平方米,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书院由门厅、讲堂、拜厅、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组成。现在拜厅的正中央还高悬着一块大匾,“模范兴国”,这是1934年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兴国的,是毛泽东的手书。两边



潏江书院

墙上挂着周恩来、朱德、李富春授予兴国的各种奖励。在这个书院里,毛泽东制定了《兴国土地法》;1930至1934年,潯江书院是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建国后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习惯到了一个新地方后,调查该地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地方史志。毛泽东在兴国,做过两次著名的调查,写成了《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两篇文章。他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毛泽东在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

1929年4月到兴国后,毛泽东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中共六大决议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较之以前的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内容有一点重要变动,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动。为贯彻执行《兴国土地法》,毛泽东在潯江书院的崇圣祠按照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他自己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这期“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共有40多人参加,他们当中有后来成为共和国上将的萧华和陈奇涵。

在瑞金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段陈奇涵代毛泽东付账的故事。1934年7月,陈奇涵随同毛泽东做社会调查,苏维埃地方政府招待他们吃饭。饭后,毛泽东因匆匆赶路,忘了交伙食费。陈奇涵走在后头,代毛泽东交了伙食费。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称赞陈奇涵“办了一件好事”。瑞金革命纪念馆的一本账本中清清楚楚写着:“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壹元捌角,经手人,陈奇涵。”

兴国有一道特色菜叫蒸笼米粉鱼。毛泽东第一次来兴国时,陈奇涵请他吃饭,就有这道菜,蒸笼米粉鱼,配上雪豆、花生米、笋炒肉、炒鸡蛋四碟小菜。谈到菜名时,陈奇涵他们请毛泽东给菜起个名字。“四星望月”,毛泽东脱口而



出。“四星望月”从此就叫开了,并成了兴国人款待嘉宾的一道传统名菜。建国后,毛泽东每次回江西,都要点四星望月,并把这道菜引进了中南海。

1933年11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兴国,检查工作,作调查研究。他和群众一起拣花生,一起种油菜,一边劳动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群塘村的樟树塘小桥坏了时,对乡苏维埃干部说:“小桥坏了,会跌倒行人,要赶快修好。”离开长冈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长冈乡苏维埃政府院子里,召开了调查总结会,将调查内容读给大家听,反复征求意见,并表彰长冈乡的工作做得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12月15日,毛泽东整理出《长冈乡调查》,1934年1月全文刊载在《斗争报》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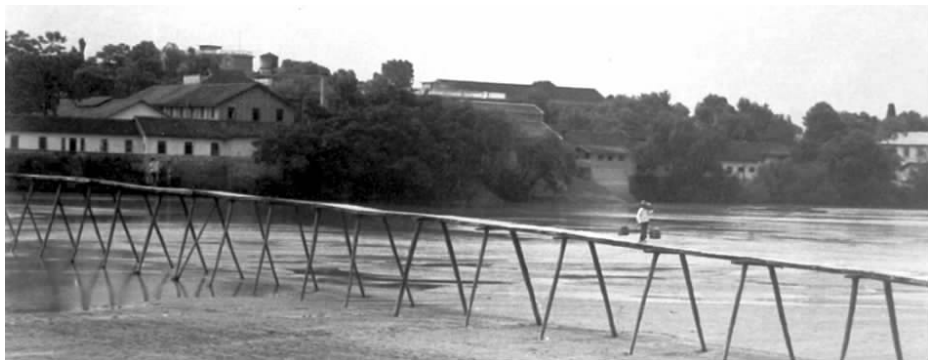
于都

雩都县始建于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因北有雩山而得名。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改雩都为于都。建县之初,于都幅员广阔,县域包括于都、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寻乌等县,处江西与福建、湖南、广东3省交界处,故有“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冲”之说。

于都有河穿过全境,就是于都河。于都河,又名贡江、贡水,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福建长汀的新乐山。河流全长319公里,自东向西,流经石城、瑞金、会昌,沿途接纳濂江、梅江、平江、桃江,进入于都境内,始称于都河。这条河绕过于都县城的南门,蜿蜒西去,出峡山、过江口、经茅店、下



红军长征过于都河时用来搭浮桥的木船



于都红军桥,毛泽东从这里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

七鲤,在赣州的八境台下,与从赣州西面流来的章江合流,章贡为赣,成为一泻千里的赣江,出万安、过吉安、经樟树,下南昌,溶入水天一色、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由湖口入长江,波澜壮阔、浩浩荡荡地奔流入海。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就是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17日至20日傍晚,濒临绝境的中央苏区、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一、三、五、八、九红色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中埠、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边,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向红军将士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无数的火把,将于都河水映得通红。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这是《长征组歌》中的一曲《告别》。

后来陆定一写过一首长征诗:“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毛泽东和20几个人走出于都北门往西一拐,“一条宽大的河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顺着河水往上走去。滚滚的河水带着黄色的泡沫翻腾着,大声地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太阳落了,冷风一阵一阵地扑来,寒意很浓。主席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八角红军帽。他迈着大步,带领我们前进”。



毛泽东是1934年9月下旬从瑞金云台山来到于都的。当地领导人安排他住在于都北门何屋,这里比较清静,进城也很近,赣南省苏维埃机关就驻在这里。北门何屋有一座坐东朝西的石门楼。墙上的石雕花卉图案,颇为精致。进了石门楼,是一个狭长的庭院。庭院南面,有一幢坐南朝北的客家建筑风格的两层民居。毛泽东当时就住在紧靠通往后院东侧门边的厢房,卧室兼办公室。

毛泽东这次到于都,离红军长征不过20多天,他是肩负特殊使命而来的。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问过他9月份到于都是不是有“特别任务”。刘英回忆:“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全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全回忆,最初博古、李德他们并不打算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



一起长征。当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红军主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中央红军机关告别苏区人民,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过了于都河。这一别便是20年,一走便是二万五千里。现在这里竖着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纪念碑,碑高10.18米,碑身为双帆造型,旁边放置着一条小船,是当年搭浮桥用过的。这里被后人称之为“长征第一渡”。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她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出发地。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她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她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

3. 庐山风云

庐山的传记大抵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写。20世纪30年代前它以文化名山闻名,而此后更以一座政治名山为世人熟知。

公元前126年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首载“庐山”,此后,有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静修在此弘扬教义。从陶渊明、谢灵运,到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朱熹,再到康有为、胡适、郭沫若,有1500多位文人巨匠登临庐山,留下4000余首诗词歌赋,庐山文化名山的地位赖以确立。古代到近代,庐山曾经有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胡适说到过,庐山有三处古迹代表三大趋势: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的“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大趋势。

20世纪3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发生于庐山。庐山云雾,从此进入到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



美庐

使庐山成为一座政治名山的，开始于蒋介石。蒋介石曾说，中国的名山，他最喜欢庐山。蒋介石自1926年到1948年，有13个年度到过庐山，一时庐山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夏都”。1933年蒋介石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轮训赣、粤、闽、湘、鄂5省军队中下级军官，与此同时，

兴建庐山图书馆、庐山传习学舍、庐山大礼堂，作为训练地之一，时称庐山三大建筑。他曾计划把五老峰下的海会建设成为南京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西京”。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两度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最后一次到庐山是1948年8月。这一次，他为所住的别墅留下了“美庐”的题刻。蒋介石怀念庐山。1965年7月，蒋氏父子与来往国共两党之间的使节曹聚仁密谈，形成了一个与中共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的条款草案，草案共6项，第一项就是：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建国后，毛泽东三上庐山，分别是1959年、1961年、1970年，共居住135天。

毛泽东在庐山，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庐。

美庐位于庐山牯岭东谷的绿阴深处，背依大月山，前临大冲河，坐落的位置，形如安乐椅。别墅始建于1903年，石木结构，由主楼和附楼两部分组成，主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牯岭散步

楼为两层,附楼一层。整个美庐庭园占地面积为4928平方米,建筑面积不足占地面积的10%,外有石墙相围,内有泉水淙淙流过,庭园显得宽敞、雅静、庄重、优美。别墅原主人是英国人赫利,赫利太太与宋美龄交好,1934年,她将房屋作为礼物送给了宋美龄。

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来到了美庐。他环视了一下花木扶疏的庭院,晨光中并未在意岩石上镌刻的“美庐 蒋中正”字样。当工作人员

介绍了别墅的历史背景后,他才饶有興味地再下楼观看美庐石刻,并戏谑地喊了一句:“委员长,我来了!”逗得大家都笑了。与蒋介石夫妇一样,毛泽东住二楼,江青住一楼。但江青说,宋美龄睡过的床她不睡,所以就把一楼卧室的床换掉了。国共两党最高领袖都住过的别墅,全国唯美庐一处。毛泽东并不介意美庐曾是蒋介石住所的历史。一天,工作人员乘毛泽东外出时,派来石工,要凿去蒋介石在美庐留下的石刻。被正好回来的毛泽东制止了,他说,这是历史,蒋介石在这里住过,不能否定。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

1959年七八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历史上沉重的一笔,但会议初期却有过一段“神仙会”的经历。聂荣臻说,“神仙会”者,即是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都能像神仙聚会那样,轻松自然地漫谈。庐山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初上山的几天,人们游兴极高,诗风很盛。毛泽东在蒋介石用过的那张雕花檀木书桌上写下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6天前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6天内连作两诗，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可见他当时愉快的心情和豪情。毛泽东的诗也引发了其他能诗者的诗兴，董必武、朱德、林伯渠、叶剑英都有诗词唱和。李锐后来曾作七律一首追忆这段生活，说是：“借得名山避世哗，群仙毕至学仙家。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漫步随吟千古句，高谈且饮云雾茶。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对于当前形势，彭德怀本是想当面与毛泽东谈出自己的看法的，但他去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已经睡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7月16日毛泽



毛泽东与彭德怀

东给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这样“神仙会”也就结束了。

彭德怀的信很快成为议论的中心。许多人赞成信中的观点，东北组几乎全部赞成。但也有人提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

“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更有人说，彭信的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人才能改正错误。后来，传出了彭德怀在西北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40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的话；又传出说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话；甚至有传言，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书记处成员，有一半被他拉过去了。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对彭德怀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说法。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彭德怀在批判他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不管最后会议给他作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回家种地，自食其力。随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在庐山召开，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毛泽东认为，这几个文件锋芒是向着反右，反右倾，鼓干劲。他还说，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庐山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庐山会议发生从纠“左”到“反右”的转向，似乎很难理解。薄一波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也感到困惑”。彭德怀更没有想到一封信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1967年7月19日，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批斗彭德怀，在回答为什么写意见书的提问时，彭德怀说，“我就不该写那封信”，“对庐山会议还保留自己的看法”；在回答“庐山会议为什么要打倒你”的提问时，他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

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总体上是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方针的，但在具体工作上，还能努力对一些错误进行纠正。但庐山会议后，中央领导在经济工作的



(上)1961年毛泽东在美庐看《庐山志》

(左上)毛泽东、江青在含鄱口眺望山景

(左下)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阅图书

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不但总体上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方针,在具体工作上也停止了纠“左”,转而“反右”。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继续“跃进”,结果导致了国家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这次庐山会议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虽然与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多

了些谨慎,但面对当时冷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困境,毛泽东仍然充满着取胜的信心。9月9日,他在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背后,题写了一首著名的七绝,题目叫《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全诗为: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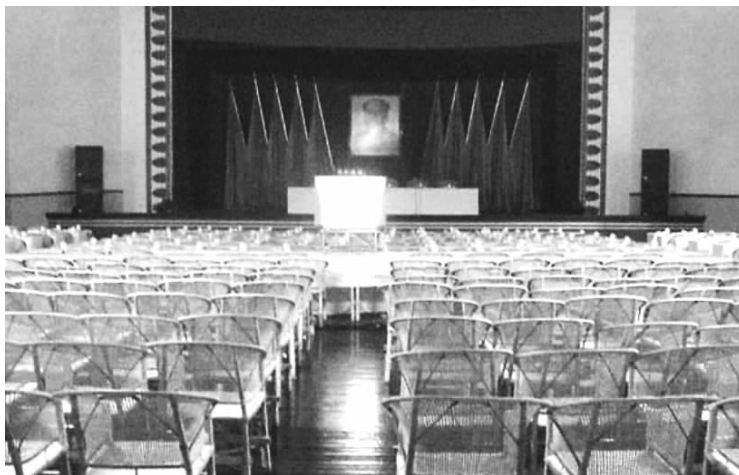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得以顺利通过,邓小平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发挥和重视。于是便有了会议主席台的一次特殊排位:毛泽东右侧第一人是周恩来,左侧第一人是邓小平,第二人为刘少奇。

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也在反思。1965年8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彭德怀。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时,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回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毛泽东笑了,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最后一次会面。

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

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第三次上了庐山。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逐渐激化;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接班人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军队的领导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称天才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也日益激化。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使庐山又一次成为见证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之地。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场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后半年内,毛泽东先后6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这说明毛泽东要改变“接班人”先担任国家主席这一过渡办法,对林彪来说,则意味着取消了他接班的过渡手段和法律保障。

另一个是称天才的问题。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林彪的发明,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毛



庐山云雾

泽东对林彪这种做法的态度是复杂的。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对林彪这种做法的无奈,“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后来,毛泽东删掉了这三个副词。

8月23日,林彪首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表达了林彪集团的基本主张:政治方面是坚持设国家主席,理论方面是坚持天才论。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次日再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获得会议的同意。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按事先的秘密串联和约定,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突出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并以此攻击江青集团。24日晚,华北组抢先发出“第二号简报”。简报写道:“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对于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这份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林彪似乎使形势变得对他有利起来。

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指责陈伯达:“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在25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找林彪谈话,指出陈伯达问题的实质就是反党。林彪对陈伯达落井下石,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毛泽东便对林彪说了《论语》里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林彪没有听懂,又不敢当面问毛泽东。回到住所后,他立即打电话回北京,问清了意思: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过分。

毛泽东没有点名批评林彪。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遭到挫败。这是林彪集团势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庐山,毛泽东十分喜欢去含鄱口。极目湖天,俯视庐山乱云飞渡,他发出过“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赞誉。一阵云雾飘过,一阵云雾又来。但1970年后,喜爱庐山、爱看庐山云雾的毛泽东,再也没有来过。

4. 千里来寻故地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
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
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填的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次重上井冈山,毛泽东



1965年重上井冈山

还填了一首《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进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包括1928年秋那首《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一生写了3首以井冈山为题的词。井冈山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个三次倾注诗情的地方。

从1893年12月出生到1949年10月建国，毛泽东到过很多地方，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住过不少地方，但建国后故地重访的，只有两处，一处是韶山，一处是井冈山。回故乡是人之常情，而重回井冈山又意味着什么呢？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李富春、罗瑞卿、郭沫若、李立三等也去登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李立三真诚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比自己高远得多，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的道路，拯救了中国革命。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为必然之势；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

“大不了再重新回到井冈山打游击”，是毛泽东晚年常说的一句话。重上井冈山后的一个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

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一件事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完成第一件事的起点，无疑是井冈山。



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或许意味着他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重新改造党、军队和国家，或许这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再看他的词。“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语意双关，既写眼前境，又抒胸中情。“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无疑是用艺术语言表达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即日以待了。